
【特别推荐】

推动当代科技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朱佳木（1）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高长武（2）

【本期关注】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性质……………刘明明（7）

农村改革是“边缘革命”还是“核心突破”？……………李嘉树 董国强（12）

【亲历者说】

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程开甲口述 熊杏林整理（20）

坚守的生命线

——中国民航安全这些年……………李家祥口述 于洋采访整理（26）

【史海烟云】

科技 40 年：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陈 冰（30）

独具历史特色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钱 江（34）

【人物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军事事件中毛泽东战略决策特点及启示……………刘征鲁（38）

刘华清与我国的海军战略……………吴殿卿（43）

10 月 15 日印刷

第 10 卷第 5 期

【海外反应】

德国主流网站 WEB.DE 呈现的涉“一带一路”舆情分析

..... 何 兰 马秀秀 (50)

【报刊荟萃】..... (54)

- | | |
|---------------------------------|-----------------------------------|
|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蔓延
需精准发力 | △“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村文化政
策关注的重点 |
| △人民政协在参与改革开放中实现
自我发展 |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的
发展演变 |
|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
体系及其发展 | △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到社会 |
| △两岸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及比较
分析 | △中国海军战略文化的历史转型 |
| △ 1952~1984 年中国 GDP 历史数据
的补充 |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 |
| △水利民主改革与水资源公共性的
彻底实现 |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
| | △中国中东外交的体制创新 |
| | △ 1949~1965 年中国阿富汗关系发
展演变的历史经验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要目及摘要 (60)

【特别推荐】

推动当代科技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朱佳木

当代中国科技史如同“两弹一星”史、农垦史、三线建设史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都是新中国历史的亮点。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科技人员还不到500人。但新中国成立后仅过了3年，人数就翻了四番，达到8000人；到1960年又翻了三番多，增至9万人；在改革开放之始的1978年，又翻了近两番，达到31万人；到2005年，仅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多达136万人。

改革开放前的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务院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大发展的序幕。1958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72年，成功提取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1973年，可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宣告培育成功。从1949年到1978年短短29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扬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震惊的科研奇迹，不仅建立了较完整的科研开发体系，而且涌现出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袁隆平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进一步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

想，相继组织实施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批准建立了57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后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中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尖端科研装置，开发了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大型科技产品。1995年，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陆续出台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科技法规，以及“973”等基础研究计划。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近五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蛟龙”深潜、“天眼”探空、墨子“传信”、高铁飞驰、北斗组网、大飞机首飞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实现了科技发展上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完备学科体系、研发资金占GDP2%以上的国家。

事实充分说明，当代中国科技史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重要佐证。正是它的艰辛历程和辉煌业绩，向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们提出了责无旁贷的时代课题，也给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珍贵史料。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指出：“读历史是智

慧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这些重要论述，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应当是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指针。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科技史研究分会的成立正当其时。这不仅因为过去从国史角度研究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还做得很不够，急需有一种社会组织、学术团体，把分散在中科院、工程院、科技部、国防部门和科协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以便共同开展作为共和国史组成部分的科技史研究；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迄今为止近70年的科技发展史中确有许多经验教训，急需从国史的角度加以总结汲取。2018年4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核心技术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必须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仅见诸公开报道的就不下四五次。这既是对眼下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的有力回应，也是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切实运用。

国史学会成立已20多年，但从各方面看，力量都不够强。所以，科技史研究分会能够依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无论对于其工作开展还是自身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保证。据了解，今天开会的这座房子，就是建在中国社科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的四个研究所（近代史所、经济所、语言所、考古所）旧址之上的。这说明，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因此更应携起手来，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共同推向前进。有中科院的正确指导、切实管理和大力支持，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分会一定能够健康成长，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研究者。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把国史和当代中国科技史立好、立准确，使它不仅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能发挥好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切实有益的智力支持。（摘自《今日科苑》2018年第9期，原文约2100字）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高长武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总是存在着一些噪音杂音，概括起来主要有

两大类：一类是质疑和责难中国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是“国家资

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一类是蓄意宣扬和兜售各种“改革药方”，试图诱导我国改革开放“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针对这些噪音杂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深刻领会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弄清楚我国改革开放要坚持的方向、坚守的立场、遵循的原则，对于排除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顺利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要把握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说明，改旗易帜、改弦更张，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邪路是走不通的，危害甚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我国改革的历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国内外有些舆论质疑和曲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始终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

总之，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这是根本性问题，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只有方向正确而坚定，路子才会

越走越宽，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关于改革开放的立场

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我们改革开放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改革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更多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

二是改革开放的自主性问题

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是为了符合一些人士鼓噪的所谓“现代潮流”、“普世价值”，不能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走，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邯郸学步、囫囵吞枣。必须警惕，国内外有些人制造了一些噪音杂音，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试图影响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比如，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有人指摘我国“改革是

有选择性的，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滞后的”；有人炮制“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试图推动所谓“司法独立”的改革；有人妄言“国企效率低下”，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妄图干扰国企改革进程；有人鼓吹西方文化“优越性”、“普世性”，企图改变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等等。面对这些噪音杂音和“改革药方”，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站稳立场、洞若观火、看破实质，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怎么完善，心中有数、胸有成竹；要坚持从我国国情、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沿着正确方向，有领导分步骤地稳步推进改革。

三是改革开放的目的和目标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搞其他什么主义”；“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关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我国改革绝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改掉、改没，而是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适应、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即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我国改革也绝不是笼统地什么都要改，而是要坚持“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具体分析。

对于那些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弊端，一定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勇于改革创新；而对于那些涉及改革性质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这是对我国改革立场的精炼概括。

关于改革开放的原则

关于在改革开放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

从为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证的角度，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不可偏废的，既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要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有利于保证我国改革开放有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无论怎么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始终坚持。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

从顺利实现改革开放的目的和目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永不改变的角度，强调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虽然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其本质和底色是社会主义，也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这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从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确保改革

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重要问题。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相互对立，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必然要求警惕和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共同富裕这一根本原则，牢记我们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把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作为衡量改革发展搞得是否成功的最终判断标准，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从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保证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的角度看，必须遵循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既涉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也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项改革之间相互牵扯和影响。特别是目

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利益互相交织，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推进必然涉及深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既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化。

因此，改革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要特别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形成合力。这就要求加强顶层设计，通过认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深化对改革内在规律的认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体制改革做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制定科学合理、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促进、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既要全面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同互动，不搞畸重畸轻、顾此失彼，又要突出重点，围绕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避免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既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又注意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特别是要继续用好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通过试点探索、投石问路、实践检验、总结经验，经过检验取得成效，看得很准了再稳步推开。（摘自《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原文约4800字）

【本期关注】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性质

刘 明 明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的重要一员，国外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焦点。其中，中国道路的性质问题无疑是一个难以避开的议题。近年来，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性质属于什么主义，国外学者展开了持久且激烈的争论。通过把握国外学者的观点，不仅有利于在碰撞中激发思想火花，更有利于在了解国外思想动态的基础上回应理论关切，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道路属于市场社会主义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告别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和流派往往将中国的改革实践视为其理论依据和希望所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旗手大卫·施韦卡特强调指出，不能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平等和富有的资本家就断定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中国未来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一是中国的领导层深知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二是来自底层的工人和农民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社会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罗默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使用市场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需要规避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精神的侵蚀，因为“缺乏‘社会主义精神’的市场机制会造就贪婪

和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将中国道路定性为市场社会主义更为妥当。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指出，对于中国道路而言，“也许最好的称谓是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尽管在某些重要的支柱产业引入了市场制度和私有制度，国家仍然掌控并指导主要的生产方式”。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大卫·尤因认为：“1978年以后，共产党所采取的路线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带来了一个富裕得多的中国。”

国外也有学者从否定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加图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道恩认为，市场及其配套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和法治，不能被嫁接到社会主义，二者无法兼容，因此，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个巨大的幻想，“未来的繁荣取决于中国是否避开市场社会主义的非自然道路，而走市场自由主义的自然道路。”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兼容的地方，似乎市场经济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中国道路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好像与市场社会主义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是带有空想性质的经济思潮，而中国道路则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是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所以，将中国道路归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妥当。

中国道路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在国外学者中认为中国道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居多数，只是因为立场和角度的差异，其称谓有所不同，诸如“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

澳大利亚的毛泽东问题研究专家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积极追求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已经侵蚀并且进而转变了他们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美国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全球资本主义，它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调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市场改革不仅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复兴，反而走向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包括日益受外国经济支配。”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在这种制度中，政治官员利用国有企业、私有的国家龙头企业、国有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确保中国在没有给潜在的国内政治对手赋权或者失去对发展节奏的控制的情况下能够带来增长、工作和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将我国的发展道路界定为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它的制度结构核心是一种将自上而下的国家引导的发展与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私人资本积累结合起来的独特二元性。麦克纳利认为，有三个制度领域在其中尤为重要：其一，不是纯粹依靠明确和强制的法律规则，私人间的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其二，它赋予中国政府在培育和引导资本主义积累方面以领导角色；其三，受全球化的影响，吸收了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许多制度安排，这种混合让某些占主导性的英美制度和价值进入中国，产生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形式”。

国外一些学者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视为资本主义的标配，所以，当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时，很容易被误读为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但事实上，从经济基础上看，私有制经济在中国远没有占支配地位，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从上层建筑来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社会主义国体有着坚实的宪法保障、群众基础和强力后盾。所以，中国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摇摆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国外一些学者观察到，中国道路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也有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子，而且处于不定型的发展状态中，所以认为，中国道路摇摆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巴西学者蒂亚戈·纳赛尔·阿佩尔认为，按照评价资本主义的三个标准：竞争性的市场、工资劳动的普遍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中国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阿佩尔看来，中国较为充分地满足第一个标准，商品和服务市场在中国早已占据统治地位，对于第二个标准，中国能勉强达到，因为劳动力已经在中国较为普遍的商品化。中国与第三个标准则有较大距离，阿佩尔指出，如果要选出一个标准来说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资

本的控制。所以，阿佩尔认为，“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但它仍然没有完全走向资本主义”。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巴里·诺顿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四个标准得到验证：一是社会主义政府控制着充足的经济资源份额，能够影响经济结果；二是社会主义政府有意影响经济，以获得不同于市场不干涉主义产生的结果；三是政府推出的政策必须能产生增长、社会保障和扶贫式的再分配的结果；四是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偏好。诺顿认为，今天的中国满足前两个标准，在第三和第四个标准上得分不高。在诺顿看来，中国除非在实现它自己宣称的政策目标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这些目标包括普遍的社会保障、适度的收入再分配、环境问题的缓解，否则不能被视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员皮沃瓦洛娃就指出：“现在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实质是一种趋同性‘混合经济’。”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查加洛夫也颇为赞同地指出：“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体。在这个混合的社会中没有大的矛盾，不同的规律和调节器——社会的和私人的、计划的和市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在一个屋檐下起作用。”

改革开放所开创的中国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所以，在表象上呈现出多面性。但是，按照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非次要方面，所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否决了中国道路是混合模式的论

断。

中国道路是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然，国外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客观评价中国的道路性质，他们中的一些学者不仅赞赏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成绩，甚至将其视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

在中国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国外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拥抱了新自由主义。但卡尔加里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韦尔则认为，中国的政党和政府仍然在绘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那里的领导人将自己视为务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理念虽然被境内外的势力所推崇，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没有确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也没有被广泛地接受为一种理论。

来自意大利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在《中国道路》一书中毫不吝惜对中国的赞美，她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功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她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模式能够灵活调整经济体制模式，使其与当今世界经济急剧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如全球化进程）相适应。”

与纳波利奥尼一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给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极

高的评价，他认为，在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被质疑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象。德国学者埃克·考普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有人问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哪里？是在委内瑞拉、古巴、越南，还是秘鲁？我的答案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资本主义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错误论调盛行的国外学界，仍然有不少学者对中国道路报以同情和赞赏，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不仅客观评价中国道路的性质，而且将中国道路视为社会主义的希望，无疑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国外学者观点分歧的原因分析

国外学者在中国道路性质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甚至产生了重大的误判，究其原因在于四点：

第一，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片面和狭隘，他们往往一叶障目，看不清中国道路的全局。具体表现为：有的学者将我国公有制经济比例的下降解读成滑向资本主义，却没有看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学者将我国的一党执政解读为极权主义，却看不到我国存在党内民主、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的事实，没有看到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有的学者错误地将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和根本特征，看不到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主

义”、“第三条道路”等污蔑性的口号冠于中国道路，出现了认识上的误判。

第二，中国道路的复杂多面性，即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并存，效率与公平兼具，政治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思想文化一元与多样共存等，这些增加了国外学者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性质的难度，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较大的解读和想象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看起来像一系列的矛盾，它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一个宣称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借助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领导，但是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照竞争性的市场原则运行，而这些原则蕴含着不平等和不安全。”所以，我们会发现同样认为中国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经不住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批评，有的则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可以相结合，并不会必然滑向“资本主义”。

第三，国内学界在中国道路的性质问题上发声不足。对于中国道路的属性，国外学者探讨得如火如荼，各种夹杂着理性与非理性声音的解释方案充斥于报刊中，而国内学界却不温不火，似乎认为中国道路的性质是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性问题，所以，没有做出有力有理有节地回应，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例如，我们自己一再声称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却没有充分阐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指征有哪些？我们一再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但没有归纳出它的普遍意义何在？结果是：在国际舆论中，国外学者掌握着中国道路性质评判的话语权。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用彻底透彻的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道路，讲清楚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积极批判和回应不同的声音，逐渐提升在这一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这个

根本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受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国外一些左翼学者仍将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量上的优势、财富平均等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持这一立场的人将手段和目的倒置，用相对次要的手段为社会主义定性，依此路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看上去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模式的失败，国外一些左翼学者则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新元素改造社会主义的旧传统，将西方式民主、市场经济、高福利等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按照这种评价标准，中国也显然难以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的学者走出了唯计划经济，唯公有制，唯西方民主的窠臼，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道路的性质。总之，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学者因为衡量标准和尺度的不同，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差别很大。

结 语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在此问题上国外学者的观点虽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但不可能真正左右和影响中国道路的性质。根据改革开放40年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理由在于：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维护者

根据苏联模式失利的教训，只要共产党员不丧失理想信念，只要作为关键少数的党的领导干部不腐化，中国就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因此，党中央实施从严治党，掀起反腐风暴，保持党员的先进性等，都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社会主义不褪色变色的重要保证。对此，国外有学者也指出，由于新任的习近平主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中国的经济体制不可能走向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

第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国外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特色”不是指国家的特点，而是可以将各层次的资本主义嫁接到社会主义上的旗号和幌子。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特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也不是摆脱社会主义的过渡术语，它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融入社会主义道路之中。“中国特色”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国强民之路。因此，我们不是在借“中国特色”走改旗易帜的歪路。

第三，当前的中国道路具有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两大特征

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虽然公有制经济量的优势在下降，但国有企业仍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抗震救灾、金融危机、国防安全、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二是在分配关系上，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虽然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失衡等问题，但共同富裕始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2020年所有人口全面脱贫就是最有力的宣言。

最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改旗易帜或发生政治动荡。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的制度似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迷茫和消沉。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复辟力量的生死斗争中坚持了下来,而且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处处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突发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高效救灾和重建,其中,以电力、供水、通信等为代表的国企不计成本投入

抢险和建设;在海外同胞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我们不惜万里将他们接回祖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率先走出低谷,而且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面对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共同富裕的宗旨,为世界人口的减贫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以说,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中国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原题为《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性质——基于对国外学者不同视点的批判性分析》,约7000字)

农村改革是“边缘革命”还是“核心突破”?

李嘉树

董国强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农业,这已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问题在于,对改革之缘起应该如何认知。这场改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进而得出“最薄弱的环节也最容易孕育改革”之类的结论。

随着罗纳德·哈里·科斯和他的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被译介至中国,“边缘革命”之说更是流行于政界和学界。一时之间,追捧者甚众,俨然成为对改革缘起的经典阐释。

尽管科斯和王宁的研究很有启发性,我们基于历史事实所作的研究却表明: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农业领域里的变革向来都是十分重要的,“边缘”的说法并不准确;此外,“革命”更像是对这场改革意义的阐述,而不是对其历史进程的准确描绘。

与科斯和王宁的结论不同,我们认为这场改革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核心突破”。

“边缘革命”的问题和改革的背景

罗纳德·哈里·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在102岁高龄之际,科斯与助手王宁合著《变革中国》一书问世,这种治学精神和对中国的深切关注,都是令人敬佩的。该书2013年推出中文版后,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赞扬,有学者认为,“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科斯教授最为关

注中国”，此书“大约是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专门讨论中国的著作”。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比较中肯的。

在此书中，科斯和王宁提出3个核心论点，“边缘革命”便是其中之一。科斯和王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启动改革，“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边缘”和“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指的就是农业。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改革先锋，是“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的体制下饱受歧视”，“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由此，科斯、王宁得出“边缘革命”的结论，认为“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的”。

“边缘革命”提出后，受到了学界人士的高度肯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极富洞见的命题，开启了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形成过程的窗口。它给中国学人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边缘’何以能够发生市场化革命？”

如果当时的中国农业真的“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真的“饱受歧视”，那么“边缘革命”之说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如若不是，“边缘革命”之说便失去了事实根基。从科斯、王宁的立论来看，他们的分析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农业处于何种位置；在国民经济领域，对农业的管控以及农业的地位如何。只有综合地分析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依据事实得出恰当的结论。笔者认为，“边缘革命”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党中央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农业的实际权重，决定了农业的地位并不“边缘”，甚至可以说农业是当时比较核心的问题。

农村改革的启动，并非在边缘地带爆发了革命，而是核心问题逐渐被突破。农村改革在地方的实践、在中央的决策，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探讨科斯、王宁提出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1976年10月，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考虑到国际舆论、国内形势，华国锋选择走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以消除因粉碎“四人帮”带来的“非毛化”争议。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修建毛泽东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不久，《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和《红旗》（1977年第1期），刊发了毛泽东生前并未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十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论十大关系》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刚刚去世，中共中央两家最重要的报刊，同时刊发这篇文章，释放出来的信号是不同寻常的。文章批评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并且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虽然重工业“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些”。此外，“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仍然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在从上到下的各级刊物上，显示出这一“最高指示”仍不可撼动。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地、完整地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这一方针，华国锋可以说是大力继承。1976年10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要切实贯

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动群众，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首先把农业搞好”。

在华国锋眼中，农业是要“首先”搞好的对象。农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回顾《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华国锋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重视，笔者想要说明：农业并没有“饱受歧视”，果真如此，可以“忽视”之甚至“无视”之；而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各级报刊在宣传中继续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恰恰说明了农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的重视。

农业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重视。1958年“大跃进”后，中国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对“大跃进”时期片面发展工业等盲动做法的某种纠偏。再看看华国锋接班前后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及构成：1976年4536亿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分别为1258亿元、1448亿元、1830亿元；1977年4978亿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分别为1253亿元、1638亿元、2087亿元。考虑到农产品产值不高、工农业“剪刀差”等因素，农业仍然能贡献25%以上的总产值，这正说明了农业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牵涉面之广、涉农人口之多，也决定了其地位之险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7年全国总人口9.4974亿，乡村人口7.8305亿，所占比例高达82.4%。

一言以蔽之，在思想上、行动上、宣传上，国家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然而这种重视未能扭转农业的困局。以1977

年为例，当年粮食总产量2.8273亿吨。如果把这些粮食全部发放给国人，平均每人只能领到595斤。扣除储备、饲料、种子等，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降低。这个极其尴尬的数据，足以说明当时农业裹足不前、困境重重的局面。为什么农业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却连自给自足都难以实现呢？原因在于，从上至下不恰当的“重视”，给农村套上了难以打碎的枷锁。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规定：“要贯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条例规定，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但是，这样的制度性规定，在现实中很难得到保障。以安徽定远县为例，由于上级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在不适宜种水稻的地方强行扩种水稻，导致每年20多万亩水稻基本没有收成。种什么、怎么种，生产队无权决定；收成如何分配，生产队也无权决定。这一切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都要由“上面来规定”。

之所以罗列上述数据和事实，笔者想要再次说明：农业并没有“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的体制下饱受歧视”，恰恰相反，中央对农业是高度重视的，但不恰当的重视确实窒息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尚未解冻的年代，农业不会也不可能游离在国家计划之外。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仍强调：“计划部门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好国民经济计划，切实把农业放在首位。”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上讨论的事关经济建设的两份文件，都是涉及农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两个文件”）。农业不仅在国民经济计划之内，且居于首位，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要求“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凡此种种，无不证明“边缘革命”之说不过是皮相之论。

改革发源地安徽的突破

如前所述，笔者大致勾勒农村改革启动前夕的背景，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民经济管理等方面，农业都是处于核心地位。农业需要改革、农村需要发展，是各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华国锋、陈永贵等人提出的主流方案，是矢志不移地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恪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即“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批判，先集体化再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这套方案，已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中。万里等人则采用另一套方案，他们在集体化上打开缺口，让核心问题有了突破的空间，最终实现包产到户。

率先、积极、普遍推行包产到户的，是万里在安徽的实践。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在安徽更是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1977年，安徽工农业生产总值168.429亿元，农业总产值位居第

一（69.5694亿元），超过轻工业（51.9745亿元）和重工业（46.8851亿元）。万里也把农业当作核心问题来抓——政治上、组织上“‘清帮’治皖”，基本理顺干部队伍后——他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农业上打开局面。1977年10月27日，万里在全省“普及大寨县座谈会”上指出：“搞农村经济政策，这要作为大事来抓。”这次会议上，安徽省委分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初稿（简称“省委六条”），万里要求把这份文件“先拿到群众中去念念”。11月20日，安徽省委正式发布“省委六条”，核心便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万里在农村改革上迈出的第一步，虽然步子不大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因为没有突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调动了生产队积极性取得了切实效果，还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表扬推出“省委六条”的安徽省委“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

我们知道：农业问题，在中央、在安徽，都是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也证明，最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当然是赋予其完整的土地权益。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土地由农民所有转化为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对高度敏感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万里当然也不例外。万里采用的办法，是将完整的土地权益分解为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使用权上进行突破，试验并扩大包产到户。即便如此，万里对包产到户也不敢贸然行事，他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变革，最终实现了包产到户的正名。所以，我们认为：农村改革的过程，是核心问题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被

打开缺口，随着缺口不断被突破，改革也逐渐走向纵深的过程。

且看万里如何破局，迈出农村改革的下一步，开始试点包产到户。1978年春夏之交，安徽遭遇特大旱灾，省委做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9月15日，肥西县山南区黄花大队党支部在落实“借地种麦”时，提出“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的办法，把田地分包给个人耕作。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1978年底，肥西县山南区77%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做法，当时属于犯忌之举。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置山南区的问题——这也是安徽省委集体第一次商议是否试验包产到户。面对几位常委疑虑，万里明确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他设想了3种情况：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省委虽然只作了“试验”的决定，但其意义却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于1961年推行包产到户性质的“责任田”，结果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批判为“代表富裕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责任田”作为“三自一包”的典型，更是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万里率先在全国试验包产到户，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所以他下令“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

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万里，深知自己

已经触碰了政策的红线，他也向上寻求支持。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开幕式，会议休息时，万里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之后，万里又找到邓小平。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期间，万里找到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要求不要再提“不许包产到户”。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有了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首肯，万里遂向前迈出一大步。1979年12月1日，在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万里称赞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过，在公开讲话中，他继续肯定“农业集体化”，仍然用“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解释“包产到户”的合理性。经过万里等人推动，在他离任前夕，安徽约有1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决策层由分歧走向统一

叙述了包产到户在安徽的实践后，我们再来观察这一问题在中央决策层如何由分歧走向统一。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意见不一。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华国锋、王任重等人属于“反对派”，陈云、邓小平等人则属于“支持派”。如前所述，华国锋不会也不能丢掉毛泽东的旗帜，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1979年2月20日，在听取杜润生汇报工作时，华国锋说：应该注意总结发挥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好经验、好典型，加以推广。得知华国锋的态度后，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指

示《人民日报》刊发张浩来信，信中指出包产到组“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结果，《人民日报》于3月15日不仅刊发此信，还配发了措辞严厉的“编者按”。包产到组都不被允许，更遑论包产到户。但是，陈云、邓小平等人，则对万里有肯定性的表态。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万里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有论者指出，这是“关键性的人事变动”，“为实现农村改革并取得成功做好了组织保证”。不久，万里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同时在中央和国务院任职，是万里推广包产到户的重要前提。不过，此时的形势仍不明朗。单在国家农委内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很强大。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坚决反对包产到户，他还指示在1980年第2期的《农村工作通讯》上，刊发《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等文章，矛头直指万里。在安徽，万里的继任者，对包产到户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再度发声表示支持。邓小平说，在甘肃、内蒙古、贵州和云南，“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

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这一次，邓小平不仅突破了4省范围的限制，而且肯定包产到户“不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的讲话，很快便以内部征求意见的形式下发。这个讲话流传甚广，有力地支持了包产到户的主张。

1980年4月8日至1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任命万里等人为国务院副总理。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开始朝着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方向发展。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不再是一致反对。1980年9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爆发了“阳关道”和“独木桥”的争论。不过，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是少数派，“多数表示沉默，有的坚决反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简称“75号文件”），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而在“一般地区”，则“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

为争取包产到户合法性，万里强力统一农委口径。1981年3月2日，万里当面批评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将他的问题上升到了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组织纪律的高度。3月11日，万里严厉批评农业部“不能自己另搞一套”，“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农民的关系这个战略高度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我们搞了三十年，农民连吃饱肚子

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他们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此后不久（4月24日），农业部那位副部长作了深刻的检讨，基本消除完“杂音”，万里便着手开展对“75号文件”的修改工作。

1981年6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大力支持万里的农村改革。1981年12月8日，国家农委向中央作《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邓子恢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就是在1962年“鼓吹”包产到户。对这一问题，国家农委的报告指出：“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

“鼓吹”包产到户的邓子恢都可以平反，这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即将到来。果然，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不仅取消了“75号文件”对实行包产到户区域的限制，还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包产到户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全面的肯定。

这份文件报送至中央，邓小平看了后说“完全同意”，陈云则让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陈云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

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政治局通过会议纪要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当即表示赞同，并签发了这份文件。这样，1982年的“一号文件”就此诞生，包产到户从此洗刷了一切污蔑之辞，实现了彻底的正名。

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人或文件，也都无一例外地会宣称其“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1962年，曾希圣推行“责任田”受到批判后，包产到户作为“三自一包”的重要内容，被安上了“瓦解人民公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等罪名。在意识形态领域，包产到户是一个重大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是判定实行资本主义的依据。邓小平、万里等人表示，包产到户“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一来，既避开了政策上的暗礁，也有助于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现象再次证明：农村改革如此重大，以致邓小平等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来破解理论的困局。这又从侧面说明：农村改革的途径，不能走激烈的变革之路，而只能是渐进式突破。

结 论

农村改革的背景、农村改革在地方的启动以及农村改革在中央的决策，其大致脉络已如前所述。这段历史叙事中，有几点结论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农村改革启动前期，农业是中国政治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上至下，都信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最高指示”。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先后次序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农业居于首位，体现了决策层对农业

的高度重视。但是不恰当的重视，把农民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上，将农民的积极性摧毁殆尽，导致农业长期裹足不前，连最基本的自给自足都难以实现。

第二，农业积重难返，各方都在谋求变革。华国锋、陈永贵等人，继续走先集体化再机械化和电气化的道路，将农业机械化作为主要解决方案，提出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将之作为“抓纲治国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而邓小平、万里等人，则以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突破口，先在制度框架内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再试验包产到户，后逐渐扩大包产到户的范围。

第三，万里、邓小平等人的改革路径，是选择相对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选择包产到户，从土地使用权着手，则要顺利许多。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正名，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因素。1961年安徽全省范围普遍推广包产到户性质的“责任田”，此后虽然一直受到严厉批判，但包产到户在安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农民自然拥护包产到户，大批受到批判的干部也希望为包产到户正名以证清白。包

产到户带来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其并未动摇土地所有权，国家的利益并未受损，所以大大减少了推行阻力。

第四，农村改革的启动，是中共领导人主导的有序的、渐进的变革。包产到户虽然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但由于人民公社的强大控制力，但凡出现包产到户的苗头，就有被扑灭的风险。万里允许肥西县山南试验，包产到户才能在此地普遍进行。万里离开安徽后，继任者批评包产到户，又出现一段时间的反复。调任中央工作后，万里通过寻求邓小平、陈云等人支持，又统一国家农委内部思想，在决策层达成共识后，包产到户才最终正名。可以说，这场变革始终是由中共领导人主导的，其路径是有序的、平缓温和的，其效果也是较为良好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农村改革的历程，毋庸置疑是一场“核心突破”。（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3期，原题为《农村改革是“边缘革命”还是“核心突破”？——对科斯、王宁的补正兼谈改革之缘起》，约12000字）

【亲历者说】

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

程开甲口述 熊杏林整理

1950年夏天，我谢绝导师玻恩教授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750英镑的待遇，回到了中国。回国后，我先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我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在南京大学，我听从组织安排，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和核物理两个教研室。1956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秘密使命

1960年夏的一天，郭影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我没有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我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却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圈电话询问下来，他们让我去城北某地报到。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那里有两栋普普通通的红砖小楼，一栋四层的灰楼是九所的办公楼。土城墙外有条护城河，后来成为小水沟。周围是大片空旷的土地，没有什么人。据说，当时为建灰楼，二机部的领导和钱三强、邓稼先等许多人都来参加劳动，聂荣臻、陈赓、张爱萍、宋任穷、万毅等一些开国将帅也到过工地搬砖、和泥、推车。

我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到了所里，吴际霖副所长跟我说：“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与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先两边兼着。”实际上，我回学校工作总共也只有一次。1961年，我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就这样，我改行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后来，我才知道，调我参加原子弹研制是钱三强的将，邓小平批准的。

说起来，历史还曾有一些机缘巧合。我在英国留学时，曾因与美国从事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的福克斯有过一次短暂接触，因此曾被怀疑跟踪过。没想到10多年后，我还真的搞原子弹了。

福克斯是玻恩的学生，我的师兄。1949年11月14~16日，在爱丁堡召开的基本粒子会议上，我见到他。玻恩为我们做了介绍，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谈得很投机。当时美国政府正对有人将原子弹的核心机密泄露给苏联的事进行调查，福克斯在被怀疑之列。他倾向共产主义，被怀疑向苏联人泄露原子弹制造技术，卷入间谍案。会后不久，他就被捕了。开会时就有有人监视他，而因为我们是师兄弟，我又是中国人，也受到了怀疑。我去法国的时候也有人跟踪我。他们将原子弹机密——福克斯——程开甲——中国共产党——红色苏联联系起来，跟踪调查我。事后，导师玻恩将这段离谱的插曲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将福克斯当间谍逮捕了，当初他们怀疑与福克斯联系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玻恩后来说：“我的许多学生，奥本海默、卢森堡、海森堡、福克斯、彭桓武、程开甲……都去搞原子弹了。”

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我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我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更重要的这是国家的需要。

我从事如此绝密的工作，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对外只允许说我在研究核反应、加速器、反应堆等。有一次回南京大学，同事们要我说说工作情况。在核子组我就讲核能、原子核的输运、中子输运等。我懂得一些，总可讲一点，但到底不是做这方面实际工作的，讲得不好，内行的施士元觉察到了，他感到奇怪。

原子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二机部九局负责。局长李觉，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7月，九局在北京建立二机部九所（1963年改制扩编为二机部九院），李觉兼任所长。最初确定研究所的任务是接受、消化苏联专家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培训人员。苏联毁约停援后，研究所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工作。

最初的探索工作大致是围绕着理论设计、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引爆控制系统、结构设计等几个方面进行。我的任务是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

当时，我有许多东西不懂，尤其是爆轰实验。但工作分下来了，也就硬着头皮

上。后来，王淦昌、彭桓武来了，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我们又走到了一起。由于王淦昌是搞实验的，所以爆轰物理研究的实验工作他就接了过去，我专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及其他一些工作。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对于这样的军事绝密，当时的有核国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泄露了一点秘密，受电刑处死，福克斯也因泄密被判了14年监禁。中苏关系蜜月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宋任穷部长去苏联参观，也只能在厂房、车间外面透过玻璃窗看看，不让进去。来中国的苏联顾问常是不念经的“哑巴和尚”。有一次，面对中国专家，一位顾问想念一点点“真经”，但顾问团的领导一声咳嗽，就把他的话打掉了，可见其戒备之深。那时，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1960年1月，二机部在“科研工作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我们的事业完全建立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自己研究，自己试验，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装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同年8月，二机部向所属单位发出了《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指出：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解决一个大难题

九所一室是理论研究室，室主任邓稼先原来是研究场论的，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物理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

面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高温高压下状态方程组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几个年轻人，他们在求解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状态方程时遇到了困难。

核材料中的状态方程，无论对象、温度和压力范围，都不同于普通的状态方程。当原子弹中的高能炸药爆炸时，原子弹中的各种材料就处在与常温常压极不相同的极高温度压力状态。核反应起来后，介质的温度可达几千万度，压力达几十亿大气压。当时，国内没有实验条件获得铀235、钚239的状态方程，国外视此为绝密，我们只有靠自己摸索。

用什么方法求得核反应起来后介质的状态方程呢？托马斯—费米理论能够描述在极高密度和压力下的介质状态方程，但它是一种统计模型，不能用于千万大气压以下的范围。对这个理论各种各样的修正，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都不能彻底解决低压范围的使用问题。邓稼先主任曾去请教过当时在研究所里的苏联专家，得到的答案是：托马斯—费米理论包括它的修正在内，只能用于研究像中子星一类极高密度的天体物理，在核武器物理中用不上。尽管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还是缺乏理论上的自信。

我到研究所后，状态方程小组负责人胡思得向我详细汇报他们已经做过的工作，也讲到利用托马斯—费米理论的担心。我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不时与他们讨论。有些概念，例如冲击波，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我在南京大学时研究过托马斯—费米理论，1958年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TFD模型方面的文章。当时，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更没有学过类似托马斯—费米统计理论。为了让大家掌握托马斯—费米理论及相关的修正，我给他们系统讲课。系

列课程讲完后，又追加了固体物理方面的内容，还帮他们复习了热力学、统计物理方面的知识，指导他们查阅国外文献资料。事实证明，这些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业务基础，也使他们能在更高的理论平台去开展研究工作、攻克难题。

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所以我们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人人都是权威。即使刚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提出的稚嫩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都被激发出来。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有时在吃饭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会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公式帮助思考。后来，别人常说起我的一个笑话。一次排队买饭，我把饭票递给窗口卖饭的师傅：“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卖饭师傅莫名其妙。邓稼先排在我后面，提醒我：“程教授，这儿是饭堂。”

经过半年艰苦努力，我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即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拿到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对我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我们在理论上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但原子弹起爆条件，必须进行炸药爆轰实验。这种没有核材料的炸药爆轰实验，称为“冷试验”。

当时，我们在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脉

的长城脚下官厅水库旁的一个沙漠地带，借助工程兵试验场一角，建立了爆轰实验场，称为“17号工地”。为了解实验开展情况，我和郭永怀有时来这里，在帐篷里讨论问题，在野外吃带沙粒的饭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也吃不饱，但积极性很高。让我们犯愁的是实验仪器的落后和技术方案的确定。那时化爆场只有OK-15、OK-17两种阴极示波器。针对实验测试的需要，我担心性能极差的两台阴极示波器会影响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1960年10月，张爱萍将军来研究所视察，听完汇报后，他提出去爆轰实验场考察。张爱萍、我、郭英会、郭永怀等人一起坐军用吉普车去17号工地。一路上，我们向他汇报爆轰物理实验场的情况。到了实验场，我让技术人员向张爱萍现场演示了两台阴极示波器的工作状况和性能，张爱萍问得非常仔细。趁此机会，我向他提出需要性能更好的示波器，他当即表态，“我回去后立即解决。”

张爱萍是位一诺千金的将军。不久，我们实验急需的先进示波器就运到了实验场。正是这次考察，张爱萍将军朴实、随和、敬业、尊重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由于工作过于紧张，我病倒了。1960年冬天，我不得不中断工作回南京养病。为早日康复，我想尽办法，向物理系魏荣爵教授学打太极拳、练气功，我学会了，一直坚持。1961年初，春节一过，我就立刻赶回北京。这年夏天，所里派人到南京帮忙，把家搬到了北京，老大、老二仍留在南京上学。从1969年到1985年，我们一直生活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

到1962年夏，在我接受主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任务时，虽然炸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的理论研究已经突

破，但还没有通过实践验证。后来，青海的原子弹研制基地进行了多次化爆验证实验（化爆冲击压缩ND3出中子），我则一直紧张地准备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无法参加。而我在九所时从事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攻关，又兼任九所副所长（后九院副院长），所以，关键的最后一次化爆试验仍然通知了我，我也立即从新疆试验基地赶到研制基地，参加试验。当炸药的冲击聚焦最终得到引爆原子弹的条件时，我们都十分激动，十分高兴，因为原子弹研制的最后重要一关终于突破。

转入核试验

1962年夏，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理论研究和制造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自行设计的原子弹理论方案也接近完成，爆炸试验问题提上了日程。此时，九所正为原子弹研制全力以赴，没有精力另外开辟原子弹爆炸试验新领域。经研究，李觉、朱光亚等人提出建议，钱三强同意，组织专门的试验研究队伍，由我代表九所开展工作。随后，吴际霖副所长找我谈话。他说：“研究所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集中精力继续把这些工作做好，而对下一步要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也需要有专人来考虑。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由你专门考虑试验的研究与准备。”他还说：“你先去，我们后面来。”之后，他和我一起去国防科委，与二局局长胡若赓见面。当时二局统管全国原子弹研制及试验。

胡若赓局长开门见山地说：“程副所长，军委分析了国际局势，要求我们加紧试验准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日程表，提出具体进度，确定大致的试验时间。尽快

拿出试验技术方案。”

我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但组织上决定要我去搞原子弹爆炸试验，我坚决服从。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就这样，我又一次转变专业方向，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由于这项工作与九所的弹体研制本身暂时关系不大，研究所也根本没有精力考虑下一步的试验工作，那时的我真可谓“光杆司令”。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科研管理模式，我的工作也没有定制的上报程序。朱光亚是所里全面负责技术工作的第一副所长，我们俩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他都会问我工作情况，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打算与他交流。比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爆方式来试验，首先应采用地面静态试验方式，以后再用空爆方式；比如，我认为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还有对核试验研究所的组建与各类技术人员需求的考虑，等等。我根据进一步的分析与计算，明确提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采用塔爆方式。我的每一步工作思考，都及时与朱光亚交流，他都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1962年9月14日，朱光亚起草了《第一种试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草稿）》（简称《计划纲要》）。我提出的有关爆炸试验研究就成了1962年的《计划纲要》中核爆炸试验部分的内容。草稿完成后，他专门征求李觉、吴际霖和我的意见：“计划纲要（草稿）已写出。（1）不知问题和看法反映的全不全？对不对？（2）好几个数字，不知是否估得恰当？……请审阅修改。如果不合用，当再写合用的。”

大家都很赞赏朱光亚科学、民主的工作作风，而我与朱光亚之间则一直互相关

心、信任、支持，保持着珍贵的友谊。

随后，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注：名称为《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上是给中央立下了军令状。这个“两年规划”得到中央批准。

1962年10月16日，在国防科委大楼，张爱萍、钱三强及二机部九局的领导进行工作协调。钱三强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爆炸试验靶场开展的技术项目就很大，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工程建设。这样，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队伍，立即着手研究立项。张爱萍提出，可以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专门从事核试验靶场技术工作的研究，请钱三强同志提出一个方案并推荐专家。钱三强同志表示赞成，并推荐我负责靶场技术工作。

1962年10月30日，张爱萍主持召开国防科委办公会议，要我参加。他希望我就试验靶场的技术准备问题进行汇报。在会上，我谈了关于试验技术方面的研究思考。我说：“关键是人，要有一支队伍尽快开展工作，提出研究课题来。”张爱萍说：“好。三强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推荐你来主管这个研究机构。”我的工作早已调整并转了过来，我说：“请给我调人，我们马上投入工作。”张爱萍说：“马上投入工作很好，也是必要的。不过，要房子暂时没有，仪器无法马上买到，机构短时间内也难健全，但研究工作要立即开始。”

11月初，吕敏、陆祖荫和忻贤杰来了。他们3人经常挤到我在九所的办公室里，研究讨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方法和工程技术研究中的问题。

吕敏，我在浙江大学教书时，他是

学生，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2年回国。陆祖荫，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毕业，分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忻贤杰，浙江大学时是王淦昌实验室助教，动手能力很强，从王淦昌那里继承了许多好作风。他们后来都成为有名的核试验专家。不久，又调来了哈工大的孙瑞藩和北京航空学院的董寿莘。其他技术骨干，基本上是我提出的专业要求和人选，由邓小平同志批示，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从全国全军各地选调来的。选调时，各单位全力支持，点名要谁就给谁。结合每人的专长，我安排他们在研究所中分别担任各级技术领导。

1963年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来报到。夏天，又有100多名全国各重点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

根据核试验研究的需要，经过论证，我们很快提出了研究所学科专业需求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研究所下设5个研究室，分别为冲击波研究室、光测量研究室、核测量研究室、自动控制与电子学研究室、理论计算研究室，同时还有资料室和加工厂。之后，为开展地下方式的核试验，又增设了地质水文研究室。理论计算研究室（五室）室主任，在1963~1970年间一直由我兼任。

事实证明，研究所的设置完全符合核试验任务的需要，是科学合理的。后来，除分出放化分析研究室外，最初设置的体制一直延续了20多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后，我们研究所成为全军最大的研究所。

1963年7月12日，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大会由

张爱萍主持，所长张超，政委张少华，我和董寿莘任副所长，我负责全面技术工作。成立大会上，张爱萍将军、刘西尧副部长等与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样，我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兼任九院副院长，直到1977年我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免去九院副院长。

作为九院的领导成员之一，我对产品情况是清楚的，每次试验产品的参数和设计都会专人告知我，产品进入试验准备前的会议，也会通知我参加讨论。武器设计的检验必须通过试验，根据试验和测试为武器研制提供有价值的各种数据，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改进设计，解决问题。

我的双重角色，使我不仅能更好地完成试验任务、检验产品设计，还能从试验测试的角度对设计提出看法。例如，一次试验中，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没有测到某重要数据，我带着理论研究和测试人员反复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指出这是弹体设计问题。于是提出改进建议，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这大概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试验之间的一种特色关系。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走出了理论、试验、设计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之路，这种研制和试验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一般研制单位与靶场之间没有的，对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改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后，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搬到新疆红山，我把家也搬到那里，直到1984年调回北京，为了中国核试验，我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年。（摘自《军事历史》2018年第2期，原文约9000字）

【亲历者说】

坚守的生命线

——中国民航安全这些年

李家祥口述 于 洋采访整理

“一年购买的飞机相当于过去所有飞机的总和”

于洋：改革开放之初，老百姓想要坐飞机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今，坐飞机出行已经太普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40年来中国民航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请问您，对比1978年和现在，我国民航的发展规模和运输情况究竟差距有多大呢？

李家祥：我举几组数字就一目了然了。1978年，全国仅有运输机场78个，年乘客吞吐量超过100万人次的机场一个都没有；2017年，全国颁证运输机场达229个，年乘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达到32个，3000万人次以上机场10个。其中首都机场乘客吞吐量全球第二（9579万人次），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全球第三（384万吨）。

1978年，中国民航拥有飞机共508架，其中运输飞机仅有144架；2017年，中国民航机队规模达到5588架，其中运输飞机有3296架。

1978年，中国民航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的占比为1.6%；2017年，中国民航在综合交通中的占比达到28.6%。

1978年，中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在世界排名37，在全球占比为0.3%；

2005年，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上升至全球第2；至2017年底，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航空运输体系，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在全球占比超过11%。

如你所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坐飞机的绝大多数人都得是处级以上干部，还得凭介绍信购票乘机。这是因为当时民航运输能力太低、运输总量上不去，只能优先保证部分人群航空出行。当时大部分民航乘客都是因公出行，所以只能在级别上采取一定的限制。现在，我国民航运输能力提高了、总量上去了，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相应地，各民航公司对于购买飞机的需求也加大了。记得我刚到民航局时，仅2007年一年引进的飞机就有300架。我去探望民航局的老局长，他很感慨地对我说：“现在你们一年买的飞机就相当于90年代我们国家拥有飞机（指运输飞机）的总和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的发展态势是非常迅猛的，周转量和运输总量年均增长幅度分别保持在16%、17%，高于GDP的增幅。目前，民航已经连续十几年盈利了。在我担任民航局局长期间，每年全行业利润为300亿~500亿元。严格来讲，这个数字并不算高。但我认为民航业还是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范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支出，所以利润不能太高；但是也不能亏损，否则发展就没劲儿了。要把握好度。有一次，中央领导同

志问我：“家祥同志，市场是公开的，你怎么能控制得住利润？”我说用飞机控制，每年引进飞机的数量要计算一下：如果想要机票价格降下来，多放一架飞机进来就可以了；飞机进来多了就少批几架，市场饱和度提高了，客座率也就提高了。这是可以调控的。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引进飞机的数量必须和安全管控水平能力一致。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如果买太多飞机，能管得了、能驾驭得了吗？人机比例合适不合适，保障能力跟上没跟上？这既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又是安全问题。

2015年，中央领导同志访美前，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等部门商定，我国将采购200架美国波音飞机。但在飞行途中，美国已经放出中国将订购300架的舆论。于是在飞往西雅图的专机上，中央领导同志问我，我国现在一年引进多少架飞机，以及300架的订单是否合理。我问：“是一年买300架还是几年买300架？”回答是3年300架。我说：“那可以答应他们。因为我们光一年就买300架飞机，主要就是空客和波音，3年肯定不止300架，还不如送他们一个顺水人情。”随后我拉了一个单子，将每年采购飞机的情况写下来上报给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团一到美国就宣布，中国将采购300架波音飞机，消息轰动世界。

于洋：如此看来，与自身相比，中国民航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那么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航又处于怎样的水平？

李家祥：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航空，目前我国交通体系的短板也仍然在航空。举例来说，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爆发时，国务院让民航局做大面积泄漏情况下的撤侨预案。我国在日侨民足有70万人，怎么撤？我们做了一个规划，

机场从黑龙江一直排到福建厦门，包括到日本有多少机场，我们的飞机怎么往那儿派，用什么样的飞机，等等。我计算了一下，全部撤侨完毕也就不到三天时间。我把数字摆出来，中央领导同志一看：“这么厉害？”我说，就是这么厉害。

但就在这时，我发现日本可用的机场足有128个。日本国土面积只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而我国面积最大的两个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机场都还没有达到30个。就连福岛旁边的一个“町”（相当于一个乡），也有一个年吞吐量18万人次的机场。美国则更不用说了，足有19700多个机场，我国一共才有229个。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一下子建那么多，但按我的想法，至少平均每个地级市要有一个机场，这样一共有333个。之后再将辐射量大的中心县配套通用机场，这样算下来有1500~2000个。我认为这个数量还是应该要有的。

“保证安全第一”

于洋：21世纪以来，民航一跃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产业，民航工作尤其是航空安全更加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说安全是民航的生命，也是民航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李家祥：由于飞机有其特殊性，一旦失事就是群死群伤，因而安全是民航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央领导同志历来高度重视民航安全工作。1957年，周恩来总理就民航工作做出了“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重要批示。这一批示突出了航空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将安全、服务和正常工作有机联系起来，科学概括了民航工作的特点，成为中国民航工

作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批示中专门强调，“航空运输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国家战略”，要求民航系统一定要“盯紧、盯住”航空安全。2015年，习总书记再次强调：“民航业是重要的战略产业，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这些都充分表明，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党中央是把航空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统筹考虑的。

于洋：一般来讲民航安全都包括哪些内容，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制约？

李家祥：民航安全一般包括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飞行安全又分为运输航空飞行安全和通用航空飞行安全。民航运输航空飞行安全是指搭载乘客或货物的民航运输飞机从发动机启动、地面滑行、起飞、空中巡航、下降、地面滑行至发动机关车整个过程中民用航空器和乘客生命财产的安全。

制约民航运输航空飞行安全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人、机、环、管等因素。其中，“人”是指包括飞行、维修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资质能力是保证飞行安全的关键因素；“机”是指飞机，即飞机是不是处于适航状态；“环”是指飞行活动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保障环境，前者如雨雪、大风、雷电、冰冻等恶劣天气以及鸟类活动影响飞行安全，后者如机场的安全保障设施设备情况、机场净空环境，等等；“管”是指航空公司、机场、空管等民航主要生产运行单位的安全管理，以及民航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监管。

飞行安全是个系统工程。只要从业人员资质能力符合规定、飞机处于适航状态、环境符合运行要求、管理科学有效，人一机一环一管形成良性循环，飞行安全就能够保证。

于洋：中国民航蓬勃发展的过程，也

是安全管理工作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请问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李家祥：中国民航安全管理工作一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摸索管理。新中国民航基础差、底子薄，各项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着瞧”，安全管理也是如此。当时说是民航，实际上是在空军的体制里，民航人中有好多都是有军籍的，民航兵也按照军人的标准进行招募和管理。

在这一阶段，全行业提出了“飞飞整整，整整飞飞”的理念，飞着飞着出事故了，就进行飞行整顿，然后再飞；强调“人盯人”的管理模式，要求领导者具有不怕“跑断腿、磨破嘴”的精神，并且，一个单位出了事故，其他单位都要开展整顿，也就是家常讲的“一人感冒，大家吃药”。其间，实践是第一位的，叫“干中学，学中干”。当然，此时也十分注重总结安全管理经验，并相继颁布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条例》等不少规章制度。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些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为保证航空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是经验管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民航业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安全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尤其强调安全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民航总结出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安全工作经验，有些经验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譬如1992年提出的“八该一反对”（即在飞行过程中要坚持该复飞的复飞、该穿云的穿云、该返航的返航、该备降的备降、该绕飞的绕飞、该等待的等待、该提醒的提醒、该动手的动手，反对盲目蛮干），经过十多年的锤炼、检验，依然具有一定的警示和指导作用。再如

1994年民航提出“四不放过”(即在处理飞行事故或事故征候时,必须坚持未查明原因不放过、未分清责任不放过、未采取措施不放过、未严肃处理不放过),这一提法被广泛认同,并且成为国家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时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这些提法也有缺陷:由于不够量化,没有明确的尺度和把握标准,因而可操作性不够强。你说该复飞复飞,什么情况下该复飞,什么情况下不该复飞,很难掌握。就像菜谱上一讲到应放多少调料时总是告诉你,什么什么少许、什么什么少许,少许是多少?也很难掌握,最后菜炒得怎样,只能靠厨师的经验了。

第三阶段是规章管理。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标志着民航安全工作进入了规章管理阶段。目前我们处于的规章管理阶段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全立法步伐加快,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以《安全生产法》和《民用航空法》为基础,借鉴国外民航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民航发展实际,民航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标准以及规范性文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民航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二是民航企事业单位重视法制教育,细化安全法规、规章标准,完善各类飞行和运行手册,加强安全生产自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进行生产,安全生产基础不断加强;三是政府监管部门强化依法行政意识,落实安全监管责任,改进监管手段,加大安全监管力度,行业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高。

目前,我国民航有140部法规规章,其中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规章91部,规

定非常详细。比如,过去讲“该备降备降”,飞行员只凭自己进行目测,现在不同的机场都制定了不同的标准,什么情况下需要备降,是能见度800米、500米还是300米,都有明确的规定。

于洋:截至目前,我国民航运输航空连续八年保证飞行安全。这意味着目前我国民航安全水平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得益于哪几方面因素?

李家祥: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全行业安全水平提高很快,目前已接近世界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统计,1978~1987年我国民航运输飞行每百万飞行小时的重大事故率是4.37,1988~1997年该数据降至2.11,1998~2007年又降低到0.23,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0.33。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航行业取得了运输航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双双为“零”的优异成绩,行业安全水平稳居世界前列。尤为令人鼓舞的是,2017年全球购买民航航班出行人员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目前在各种交通方式中,最安全的就是飞机了。

我认为,近些年行业安全形势较好,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员工素质明显提高,二是飞机性能明显改善,三是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四是规章标准日臻完善,五是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管力度明显加大。总而言之,在民航人心中,“安全第一”不可动摇,实现持续安全是神圣崇高的目标追求。我相信,经过胸怀强国梦想的民航人的拼搏奉献,团结奋斗,中国民航的安全记录会更加出彩,中国民航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摘自《纵横》2018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史海烟云】

科技40年：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陈 冰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片曾诞生“四大发明”等伟大科技成就的古老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那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科学的春天”；那一年，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一股热爱科学、投身科学的热潮；那一年，屠呦呦和青蒿素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的“明珠”被擦亮……那一年，有很多个开始，中国科技再次起航。

接下来的40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孜孜以求和披荆斩棘，在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骑”着“蛟龙”探深海，“戴”着“天眼”观宇宙，还可以用北斗导航，用量子通信……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我们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今天，走进新时代，我们站在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起点，迎来又一个春天。

特别的1978年

1978年3月18~31日，被誉为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

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次大会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极大提振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新热情。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为此次大会写下了振奋人心的名篇《科学的春天》。此次大会以后，“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陆续出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科技成果，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全社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集邮的人一定会记得，为了纪念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当时的国家邮电部还特别发行了一套全国科学大会的小全张纪念邮票，上面包含科学的春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三枚邮票，特别之处还在于这些邮票并没有打齿孔，所有的齿孔都是印上去的。

此后，中央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和发展部署，先后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禁锢科技界的桎梏，迎来共和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同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肇始阶段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此次会议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实际，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并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实，早在1978年之初，我国科技事业就率先在国际合作中迈开步伐，并融入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中。1978年1月，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启了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要和富有活力的新领域。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总体开放的先行者。同年，我国又相继与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月，中美签署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由此，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前30年和后10年

1983~1984年，理论界展开了一次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大讨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有关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其中关于我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失之交臂，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李约瑟难题”等问题的讨论，更让在近代史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失去了发展机会的国人深受启发。

1985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推出了改革科研院所的财政拨款制度，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探索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开辟技术市场，鼓励技术入股以及科技人员创办或领办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更是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面向国计民生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安排。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和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做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纲要立足国情和远近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了一批科技支撑发展的重点领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筹措实施若干重大专项，从应对未来挑战出发超前部署了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同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等方面也进行了总体部署。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做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系统地谋划和部署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同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发展，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

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在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改革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国家实验室、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打造区域性创新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系列部署，提出了143项重大改革任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指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40年的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这40年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10年、中间20年和后10年。前10年是改革的启动部署阶

段，也是改革的阵痛期；中间20年为改革深化推进阶段；后10年为国家新型创新体系建设探索阶段。

前30年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推创新、求发展，并且从中努力实现了“从被动改到主动改、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转变。后10年则是在学习和摸索如何以创新促进改革并引领新的开放，这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探索期，以及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时期。尤其是根据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新要求，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政策、改革等重大举措又进入一个密集调整期，以接近“摩尔定律”的周期对科技创新相关工作不断做出研判、调整和重新部署。这个阶段也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得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进步较快的时期。

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以要素总量、投入规模为标志。近40年来，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提高，2016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1.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型科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资源库、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一批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等相继投入使用，构筑起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基础。

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光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1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3位。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群体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讯、海尔、中车、国电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在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已升至全球第22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 and 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

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新近又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同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有影响的“双创”交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我国的“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领先（跑）、并行（跑）、跟踪（跑）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涌现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大飞机首飞、克隆猴诞生……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前有关中外技术竞争的比对研究，在信息、能源、环境、生物、农业、海洋、交通、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公共安全10个领域1149项技术群体中，我国已有17%的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31%的技术与国际先进基本同步，当然也有52%的技术与国际水平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

目前最能体现我国技术水平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套技术装备和系统性、平台性产品的出口，如超算系统、水稻杂交生产、青蒿素疟疾治疗、高铁系统、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方案、水/火/核电系列设备、定位导航授时（PNT）服务技术体系等等，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输出的创新贡献。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指出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

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他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中心和创新高地”。（摘自《新民周刊》2018年第26期，原文约7000字）

独具历史特色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

钱 江

2018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七七级和七八级两届大学生近70万人入学40周年。他们走进大学实际上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前奏曲。在从此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两届大学生发挥了中坚和栋梁作用，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他们是不可复制的大学生群体，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录取率的历史对比

1977年12月上旬和中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别举行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这是从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最终录取27.8万人，录取率接近4.9%。这27.8万人中，包括4万名各类大专班录取的学生。1977年高考创造了1952年新中国实行统一高考以来最低的录取率，也是中国有了现代大学教育之后的最低录取率。半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高考中，有63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万人，录取率为6.3%。像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连续两届如此低的录取率为历史罕见。进入20世纪

80年代后，大学录取率逐渐达到两位数并逐步升高。

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在1978年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入学，1982年同年毕业，按过去习惯称谓，同属1982届。但由于考试年份不同，为便于区分，从这年起，中国大学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这是恢复高考在教育制度用词上的第一个明显变化。

高考是典型的“选拔考试”，低录取率表明选拔质量之高。

1977年高考会集了从1966年停废高考至1977年之间11年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加上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极少数将于1978年毕业的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共累积了前后达13年的考生。从理论上说，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识青年”，都可能成为报考者。教育部曾有预估，认为报考人数可能达2000万人，计划招生21.5万人的话，录取率刚刚超过1%。

考虑到考生中大部分人在十年浩劫岁月里失去了学习机会或荒废了学业，为缩小考试规模节约考试成本，不少地区采取初试后再报名高考的办法减少考试参加者，最后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人。

对比历史数据更可以确定，七七、七八级考生脱颖而出殊为不易。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发展。

1949年当时全国有各类高等学校205所，在校学生11.7万人。

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并从这年开始进行全国统一高考。1953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81所，当年8万多人报考大学，录取新生7.9万人，录取率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高的一年，意味着绝大多数报考者都能被录取，因为这年全国高中应届毕业生总数只有5.6万人，还需要调配受教育程度不足者（他们通常被称为“调干生”）入学以满足招生计划。

1958~1960年，全国高等院校出现连续3年“跃进”，学校总数激增到1960年的1289所（其中1960年当年就新建365所高校，其中有许多条件很差），录取新生32.3万人，达到峰值。

1961年即行调整，高校缩减到800余所，清退1960年招收的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录取新生16.23万人。

1961~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率分别为：45.43%、27.5%、33.42%。

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4~196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高点。1964年全国考生共449366人，录取154245人，录取率约为34%；1965年全国考生有35万人，录取16.4万人，录取率约为47%。

对比“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恢复高考入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普遍产生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主要原因在于“文革”停废高考造成的考生积压。

恢复高考否定了出身等级制度

由于“文革”，1966~1969年之间，大

学停止招生4年，切断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正常途径。

1970年秋，北大、清华两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4000多名。1971年起，大部分高校陆续重新招生，在否定文化考试的前提下，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在“文革”中采取这种以“推荐加批准制”为核心方式进入大学的学生学制3年，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一制度结束于1976年夏，在这年8月明确宣布废止，历时7年间共有94万人成为“工农兵学员”。

在“文革”上大学经“推荐制”提名，通过政审决定录取，家庭出身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由于生源所在地行政领导掌握能否入学的最后决定权，学员的文化程度被普遍忽略。

1977年恢复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所学校和学科类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出身等级制，在大学教育上为实现社会公平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邓小平果断决定当年恢复 高考功在千秋

“文革”中“推荐制”上大学给高等院校教学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严重破坏了教育需要持续不断、需要学生文化程度基本一致的基本规律。“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文化程度，要求“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实际上则是从小学至高中参差不齐，具有高中毕业教育程度的不到20%，普遍

为初中文化程度，相当多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就人为造成了教育阶段断裂，大部分学生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给大学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学带来极大困难。

“上山下乡”运动和“推荐制”上大学，非但切断了优秀中学生正常升学的通道，而且影响了在校师生的教学和学习，中学教育水平大幅下降。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就恢复高考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结果完全印证了邓小平的判断，在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数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文革”中“推荐制”上大学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教育连续性规律。然而，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要否定“推荐制”上大学的做法，还是充满艰难的。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议在招生办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审标准上出现争论，会后决定将在当年招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但对原有的“十六字推荐入学方针”没有改动。

就在这时，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负责国家的教育和科技工作。他在8月4~9日，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谈。在8月6日下午的座谈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对“文革”中大学招生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场拍板：“文革”中的大学招生“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一年中召开两次全国高校招生

工作会议，为新中国教育史上所仅见。

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整整持续44天，多数人依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摆脱“两个估计”，不敢全面恢复通过统一文化考试来录取新生的高考制度。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挺身而出，写出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指出“两个估计”是“文革”中极“左”思潮产物，危害极大。该文编印成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特628期《情况汇编》上送。

邓小平及时看到了这份内参，于9月19日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和雍文涛谈话，严厉催促恢复高考，要求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邓小平否定教育部原拟的因袭过往的招生政审意见，明确：“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头，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说的“择优录取”，就是指按照考试得分，高分优先录取。这个基本原则的确定，还顺带解决了此前两次招生会议上争执不休的即当年要录取多少应届高中毕业生问题。第一次太原招生会议制定了5%的比例；8~9月的招生会议突破了这一点；10月，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的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中，将这个比例提高到20%~30%，但有一个附加语：“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实际上，“择优录取”已在无形中排除了这个比例。从此，在高考中再也没有了应届生比例一说。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1977年高校招生事务，同意当年恢复高考。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标题，宣布当年恢复统一高校入学考试，同时发

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篇社论由穆扬起草初稿，定稿由邓小平审定。

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进程的演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先声。

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群体的 不可复制性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教育部就大学招生答记者问明确：过去（实际上只是“文革”中）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现在恢复高考，被录取者要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由此录取的七七级、七八级两级大学生，使中国的大学历经11年后，终于得到了文化程度整齐的大学生。在各自专长上和自学能力上，这两级大学生超过了往届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是在“文革”十年中坚持自学的青年。他们中间即使是没有上过高中的青年，也通过自学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些人的成绩极为优异。

他们的考试成绩引起了教育部特别关注。按原定计划，招收七七级学生21.5万人。完成招生计划后，国家计委、教育部于1978年2月决定，采取走读解决住宿等办法扩大招生，扩招本科生2.3万人，加上办各类大专班招生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其中大学本科生录取率为4.1%。

这两级大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报考年龄上限为30岁，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年龄之差超过10岁，不同年龄间文化因子的交流变得更加丰富。

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优秀群体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

两条：

其一，他们大多数人经历了“上山下乡”，在农村或工厂、军队的长时间锻炼，社会阅历的丰富超过往届和后来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们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已经上了一次“社会大学”。进入大学，两种“大学”叠加，更加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和认知能力。

其二，这两级大学生与之前和后来的“应试教育”毫不相干，他们是通过基础知识考试遴选进入大学的。七七级大学生从1977年10月21日新闻媒体发布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到12月上中旬考试，短者40多天，长的也只有50余天，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完全生疏了考试的情况下参加高考的。他们通过自学获得的扎实基础知识通过高考得到了验证。七八级大学生的高考准备时间也只有半年左右，同样要以基础知识来应对。

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入学后的自觉、刻苦学习精神得到教师们的普遍赞扬。出于这些原因，这两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人才辈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其中有许多教育学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在中国大地上激起了强烈反响，“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深入人心。“文革”中蔑视知识、摧毁教育体系的做法被彻底摒弃，高等教育走上正轨。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和改革开放伟业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历史意义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仍然充满进取精神，令人神往。（摘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8期，原题为《独具历史特色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纪念恢复高考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约6000字）

【人物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军事事件中毛泽东 战略决策特点及启示

刘 征 鲁

毛泽东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和不断地学习总结中积累了极为深厚的战略素养，每每在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关口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做出正确决策，使我党我军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战胜了一个个对手，赢得了一个个胜利，也使自己成为中外瞩目的战略家、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战略视野进一步扩大，军事思想进一步发展，卓越的决策才华在很多军事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战略决策的宽广视野

与弱者交手，占据各种优势的一方掌握着主动权，可进可退，决策的空间相对比较大。例如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怎么打，从哪里打，打多久基本上都是列强说了算，清政府多数情况下是被动应对，被牵着鼻子走。但与强者过招，却十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敢不敢过招，怎样过招，设定什么样的目标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纵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我党我军以弱抗强，在困境中奋进勃发。而在与强者过招的过程中，也凸显了毛泽东作为一名战略家决策的宽广视野和善于抓住关键矛盾、主要矛盾的卓越胆识。这其中，以抗美援朝决策体现得最为明显。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海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悍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10月上旬越过朝鲜“三八线”，将战争引到中朝边境，并轰炸我东北边境城镇。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严重威胁着我国华东、上海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在这个危急时刻，敢不敢起而抗击美帝国主义，支援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这个决策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这是因为当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险峻。与解放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部分都是经历二战洗礼的王牌部队，装备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和航空母舰等武器装备，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强过国民党军队和侵华日军几倍乃至十几倍对手。并且，这场战争是出国作战，地形不熟，没有根据地，经过战火荼毒后的朝鲜，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给我提供支援，一切都要依靠国内后勤保障。从国内视角看，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已经被剿灭，但还有上百万残部在西南、中南、西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肃清任务压力不小。特别是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有一定战斗力，如果不能一鼓作气解

放台湾，再寻找一个合适的战略时机恐怕很难。此外，西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蠢蠢欲动，谋取“独立”的倾向日趋明显，严重威胁我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国内经济基础损毁严重，百废待兴，战后重建工作压力十分紧迫，这时候再打一场国际战争国力恐怕难以支持。

这些因素毛泽东心知肚明，因此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决策他慎之又慎，自己也曾说过：“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人命关天嘛，如果这一仗打得不好，危及国内政权，甚至丢了政权，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待呀！”

事实上，受限于国内外的困难局势，参与决策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也反对出兵朝鲜。不过，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雄伟的气魄和非凡的胆略，其对全局的把握，对形势的精准分析，以及更高的战略视野凸显了出来。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认为，美帝国主义虽有强大的财力和军力，但它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同时，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政治上孤立，本质上虚弱。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线太远，要隔两个大洋；第三，战斗力太弱……不如德日的军队”。同时，其兵力也不足。在我们方面，虽然经济、装备落后，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出师有名，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内部团结，兵力雄厚，有着久经战争考验的党和军队。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利弊因素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我们“应当

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抗美援朝的实践和战后历史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决策无比英明，战略收益极大。反观当前，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抗美援朝决策的得失。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动荡不安，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的困难形势下，质疑抗美援朝战争的声音也得到不少认同。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战略短视的结果，也是忽略当时国际环境的错误判断。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抗美援朝固然有支援朝鲜抵御美国入侵、保卫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安全等现实需要，但这场战争最本质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不能坐视不管，而一旦打赢了这场战争，无疑对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是大有裨益的。同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主要是中美交锋，这也是第一次让美国意识到新中国的崭新力量和形象，而把美军逼回“三八线”，也让美国再也不敢忽视这个曾被世界蔑视的东方大国。可以说，抗美援朝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主角”，这对重塑世界格局，特别是重塑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无疑是收益巨大的。这种战略收益，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负担、小范围外交被动所能掩盖的。

事实上，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会为短期的、表面的、局部的利益所困扰，而是直戳本质，直捣核心，抓住最关键的矛盾予以破解，在必要的时候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也是值得肯定的。而毛泽东的决策凸显这一特点，在复杂情况下，他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总能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予

以分析判断，其决策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绝不能从战术和局部的视角分析评判的。

政治军事仗

战略家与军事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战略家具有全局视野，除了军事安全、国防安全等重要因素外，还会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在战略家的视野中，军事上的胜利虽然重要，必须争取，但并非战略全局胜利的唯一因素。多数情况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

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百万之师，并且在抗美援朝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成为世界闻名的善战之师。按照霸权主义的思维，这支军事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拓展和延伸国家利益，扩大地区话语权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大棒”。不过，作为我党和我军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并没有把军事“大棒”摆在前面。作为世界级战略大师，毛泽东十分清楚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对外军事行动中，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理念十分鲜明，军事始终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途径。这里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决策比较典型。

印度独立后，一直以英国殖民者的正牌继承人自居，宣布继承英国在周边地区的殖民权益，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逐步向我国境内推进蚕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封锁围困、中苏矛盾公开化扩大化，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政策性的失误，致使中国出现了严重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也不断加紧酝

酿“反攻大陆”，达赖喇嘛叛乱失败，逃亡印度。在这种形势下，印度认为有机可乘，进而在边界问题上大举闹事。同时印度把大肆反华作为向美、苏两国捞取好处的筹码，继而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美苏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面对印度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直接回击，而是寄希望于尼赫鲁能够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因为在毛泽东眼中，中印两国共同的历史际遇，都曾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也有长达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理应携手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朋友，并且，中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及其盟友从东南方向对我施加强大压力，以我国的国力，不宜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抗大国。所以，毛泽东在中印边境争端上长期采取容忍的策略，并通过接见尼赫鲁、派周恩来访问印度、驻印度大使潘自力提交外交文件等方式，反复向印度传达我国的和平提议，甚至把中国政府友好的态度、军事战略的重点以及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立场等核心立场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不过，尼赫鲁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边境挑起争端。

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毛泽东曾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指出：“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生动说明了中国的和平意愿，也彰显了在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中，军事始终不是最优先的选项。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彰显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威胁的坚强意志。

在分析了尼赫鲁判定中国不敢与印度

在边境作战是其侵略行径最大的支撑后，毛泽东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1962年秋，在西山召开的中印边界问题作战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说，“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搞点小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但是我们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起码要保证中印边境30年的和平。”

1962年10月10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序幕正式拉开。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从东西两线发起攻击，迅速击溃一线印军，并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将侵入我国境内的印军据点一扫而空，并将战线迅速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推动。印军对我军强大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战争准备浮于表面，一线作战军队大部分战斗意志薄弱，在我军迅速而猛烈的打击下迅速瓦解溃逃。我军取得了边境反击作战的压倒性胜利。

前线捷报让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不过，就在我军高奏凯歌，势如破竹，即将跨过传统习惯线，直扑印度大平原之时，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按下了停止键，并让我军撤回战前中印实际控制线我方一侧，并再次后退20千米。这项决策在很多军事家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在毛泽东眼中，军事上的胜利并非中印斗争的唯一标准，而多占土地更不是中国的主要目的。发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核心在于以打促谈，让印度正确认识自身实力和我方的强大实力，使印度重新回到谈

判桌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成为可以友好相处的伙伴，而非兵戎相见的对手。事实上，对印自卫反击战也很好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打出了国威军威，强化了中国不怕任何霸权的国际形象，极大地震慑了印度，使其在对华作战中始终难以摆脱当年失败的阴影，不敢在边界问题上有过分之举，这给我国西南战略方向带来了50多年的相对稳定与和平，为我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应对来自美国、日本等东南方向的主要威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在全世界面前彰显了正义，暴露了印度的无理，有利于中国赢得国际舆论，掌握政治主动。所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军事仗中国打得漂亮，为政治仗的胜利赢得了主动。而贯穿其中的政治仗更是凸显了毛泽东战略决策的英明和纯熟。

指挥艺术更加纯熟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对局势的把握超乎寻常，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指挥艺术更是世所罕见。长征期间，他的四渡赤水瓦解了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精妙的指挥令人拍案叫绝。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严峻局势下，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反其道而为之，避其锋芒，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地带，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这种出人意料的指挥智慧为我军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面临更多的挑战，而在与美苏等大国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更加纯熟，特别是在处理渗透大国因素的重大事件中，毛泽东的指挥决策更加灵活，万事拿捏恰到好处，创造了很多人类历史上的“奇闻”，

但这些“奇闻”则渗透了深邃的政治智慧和精妙的指挥艺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炮击金门作战就是一个生动案例。

1958年5~7月，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掀起高潮，黎巴嫩人民推翻了夏蒙反动政府，伊拉克建立了共和国。美国、英国等为维护地区私利，公然出兵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动，宣布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为了打击蒋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中东人民的革命，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斗争，7月18日，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我军随即进入紧张的备战准备中。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主席一声令下，福建前线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整个金门岛顿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两个多小时的首波炮击中，我军共发射炮弹近3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第二天，我军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国民党军对金门的海上运输被迫中断。

金门是远离台湾的海上孤岛，补给全部依靠海运。不过，在我军的猛烈炮击和封锁下，台军的补给船根本靠不了金门的码头。很快，金门守军的储备物资就被消耗殆尽，几近弹尽粮绝，不断向台湾呼救告急。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请求美军舰艇护航，以为金门守军输送给养弹药。

面对危局，美军不得不硬着头皮派出军舰，为台军舰艇护航。美军的直接介入，使金门的斗争更加复杂。当初，毛泽东决定打金门不打台湾，是因为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金门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打金门可以不

和美国人直接交锋。现在美军参与，而且美舰和蒋舰相距只有2海里。在这种情势下，我军打还是不打？如果打，万一打伤击沉美舰，会不会引发出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事关重大，叶飞急电请示千里之外的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做出指示：“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时，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每1小时报告1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为了万无一失，叶飞又问：“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们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果断地指示他：“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9月7日中午，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卸下补给物资。毛泽东即下令开火。叶飞迅即命令各炮群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前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万炮齐发，以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跑，蒋军船只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当即被我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毛泽东略施小计便把美国的底牌摸得底朝天，并暴露了美军色厉内荏，貌似凶恶强大，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的本质。

在失去补给渠道后，金门变成了一座孤岛。按照很多观察家的判断，中国应该顺势消灭国民党守军，收复金门。但毛泽东再次出人意料，并未下令收复金门。他认为，如单独夺取金门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制造“台独”或“两个中国”将更为可能。

炮击金门后，美国认为金门、马祖过于靠近大陆，根本守不住，是防御上的

包袱，想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马，专守台湾，以台湾海峡为界停火。不过，蒋介石坚决反对。

由于台湾当局仍不肯接受和谈，美国又大力宣扬“永久停火”，10月25日，由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

在人类战争史上，这种公开预告的炮战闻所未闻，但正是这个看起来有些怪诞的方式却蕴含了精妙的战略安排：单日

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粉碎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双日停，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将蒋介石拖住，并对台湾军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惊异地说，这种打法是“一场滑稽歌剧性战争”。

事实上，这种“双日不打、单日打”的巧妙战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挥决策的灵活性，使金门炮战成为一场政治仗，使处于战火之中却又相对安全的金门像一根脐带一般，把台湾拴在了中国大陆这个“母体”上，使台湾与大陆的距离不是一个宽阔的台湾海峡，而是咫尺之遥，这从地缘上极大地密切了两岸之间的联系。（摘自《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2018年第8期，原题为《指点江山的背后 建国后重大军事事件中毛泽东战略决策特点及启示》，约9000字）

刘华清与我国的海军战略

吴 殿 卿

海军战略，即国家统筹海军建设和作战全局的方略。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海军战略在中国的军事生活中却不失为一个生冷概念，是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中国海军战略，将海军战略理论正式写入中华民族的军事大典。

正式提出中国海军战略

1985年是中国军队大变革的一年。是年5月，中央军委做出两项重大决策：一

是裁减部队员额100万；二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临战状态转移到平时时期建设的轨道。落实军委决策，精简整编，军队建设实现从数量建军到质量建军的历史性转变，迫切需要加强对海军建设的宏观指导。同时，通过几年来在部队中持续开展中国近代史教育和海军军事理论宣传，海军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海洋意识、海权观念显著增强。审时度势，刘华清感到建议党委正式研究提出海军战略的时机成熟了。12月初，他征求海军政委李耀文的意见，李耀文全力支持：“这符合

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要研究制定长期建设规划和发展战略的精神，也有利海军当前的实际工作。”

12月13日，为探讨协同沿海军区登陆作战中兵力使用问题，海军在北京举行首长机关单方一级图上演习。刘华清与李耀文任总导演，海军机关各大部170多人参加。经过8天的理论研讨、图上推演，演习于20日结束。刘华清在这天的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讲话一开始，刘华清即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次演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海军战略？如何认识海军战略？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海军的建设和作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接下来，他依序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海军战略；二是制定海军战略的依据是什么；三是我国海军战略的内容。之后，他又系统讲了海军战略对海军建设的指导，以及海军兵力的战略使用等问题。

刘华清讲话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经过反复推敲，加之有高级干部军事研究班和理论宣传的基础，与会人员都感到清楚明白，“大有收益、茅塞顿开”。然而，海军党委常委中却有个别人不以为然。有的同志会上不表态，私下在机关干部中散布不满言论，说怪话，甚至“上纲上线”说：“搞了‘海军作战方针’又搞‘海军战略’，不知司令员想干什么！”“‘战略’是高层次的东西，应由军委提出、各大单位贯彻执行，海军自己提不合适！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战略’，那还叫‘战略’？在苏联，也只有斯大林能提‘战略’二字！”言下之意，提海军战略是出风头、闹独立、搞山头。这是原则问题，刘华清不能听之任之。1986年1

月下旬，海军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年度工作。刘华清在25日的总结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明确海军战略问题。

刘华清说，根据军委邓小平主席关于海上战略和海军建设的指示，我曾就海军战略问题谈过初步意见。海军与其他军种比，有共性，也有特性。海军是一个综合的、多兵种的军种，各兵种的均衡发展和综合战斗力提高，需要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另一个特性是海战场的相对独立及其战略地位。现代海战具有立体性，其范围更为广阔，能使海军兵力的活动免受领土面积限制。因此，现代战争中海军的作用和海战场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此外，海军对各种保障依赖性大，兵力的机动和各种保障要求整体上的协调，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贻误战机。战争中海军兵力的恢复也比较困难，而且时间相当长。因此，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需要确定一个海军战略。海军战略是在国家总的军事战略下用以筹划、指导海军建设和作战全局的方略。它从属于总的军事战略，同时又是总的军事战略在海军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我们明确了海军战略，才能明确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他强调指出，不能认为只有帝国主义为了争霸、称霸才需要使其海军成为“战略军种”，社会主义中国不称霸，因而也就不需要一支足以执行战略任务的海军。恰恰相反，为了寻求友谊，促进文化和贸易交流，我们尤其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个别私下乱发议论的同志，他提出了严肃批评：“海军战略是个新东西，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在会上讲，就是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嘛！有的同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海军机关也不能滋长这种风气！”讲到这里，刘华清手点着桌子严

肃指出：“海军战略的研究要深化，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开展讨论，但绝不允许会上不发言背后搞小动作！”

党委扩大会后，在李耀文的提议下，海军党委常委会专门安排时间讨论了明确海军战略的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对研究海军战略理论的认识，一致赞成以“近海防御”作为海军战略的表述。私下犯自由主义的同志，也自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海军战略的深化、完善和扩大宣传

若干年后，谈起当初研究海军战略的动因，刘华清说：“我为什么下决心研究和制定海军战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捍卫祖国蓝色国土的主权和权益，仅凭海军几十万官兵的忠诚、勇敢、奉献与牺牲精神是不行的，必须强化我们整个民族的海洋观念。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强烈的海洋国土、海洋经济、海洋科学和海洋国防的观念与意识，经略海洋、振兴海洋才能成为我们民族的整体意志和自觉行动。”基于这一理念，在海军内部正式提出海军战略后，刘华清又组织力量对海军战略理论进一步深化、完善，做了扩大宣传、征求意见的工作。

1986年2月17日下午，刘华清在海军机关办公楼党委会议室约见海军司令部军事工作研究室主任王春法，南京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研究员张予三、赵克增等，向他们下达了帮助整理海军战略文稿的任务。刘华清说，今天请你们来办件事。国防大学张震校长请我到学校去讲课，要讲海军宏观指导的内容，就是讲海军战略，主要给教员们讲，高级班学员也可能参加。这个问题很重要，去年我在海军机关图上

演习时讲了，在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也讲了。部分人受“全军只能有一个战略思想”想法的影响，不赞成这种提法；多数人则认为海军战略有道理，希望多讲讲，多宣传这个问题。这次去国防大学讲是个好机会，可以扩大宣传，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前边几次讲，准备不充分，也不系统。你们看书多，理论了解多，请你们把问题考虑周全一点，系统、完善一下，争取个把月搞出来。接着，他将研究海军战略的意图，讲稿内容、主要观点，及至大、小标题等，都作了具体交代。最后，刘华清将此前的讲稿、文章、相关资料一并交与他们。四天后，即2月21日下午，刘华清再次与王春法、赵克增等研究提纲，并对文稿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4月中旬，整个讲稿修改完成，刘华清逐字逐句审改，题目定为《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共两万多字，分为三大部分：（1）海军战略的形成和发展；（2）关于我国海军战略；（3）海军战略指导下的兵力运用。内容要点是：

第一，海军战略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军事范畴。它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海上武装斗争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它从属和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在海军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当代世界各国海军战略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远洋进攻型、区域防御型（或区域进攻型）和沿岸防御型。美、苏两国海军遂行的是远洋进攻战略；英、法、德、日等国海军基本上采取区域防御型战略。所谓区域防御型战略，是就其主要使命来说的，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战略进攻。

第二，提出我国海军战略，符合战略的多层次结构的理论原则；海军战略是军委战略方针在海军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海军建设和未来作战的内在要求；提出海军

战略是海洋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海区的战略地位及海战场形势的需要，是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要求。

第三，我国的海军战略是“近海防御”，属于区域防御类型。战略性质是“防御”，作战范围是“近海”。海军战略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应付针对我国的海上局部战争，遏止和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自海上的侵略，保证我国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我国海军主要作战对象，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第四，我国海军的作战海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所谓“近海”，不是200海里，而是一个战略概念。这一海区既包括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诸岛等我国固有领土，也包括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归我国管辖的全部海域。随着我国经济力量、科学技术水平的增强和海军力量的壮大，海军作战海区将逐步延伸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最终达到我国海上战略防御所需要的全部范围。

第五，海军的战略任务分为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两个方面。平时期的任务主要是：实现和维护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统一，保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作为海上威慑力量遏制敌人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应付可能发生的海上局部战争；支援和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战争时期的任务是：独立或协同陆、空军作战，有效抵御敌人来自海洋方向的进攻；保卫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线；在统帅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战略核反击作战。

第六，“近海防御”战略要求海军必

须具有相应作战能力。要能在近海主要作战方向上一定的时期内夺取并保持制海权；能在必要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与中国海区相连的重要海上通道；能在中国海区相邻的海区作战；具有较强的核反击能力。

第七，“近海防御”海军战略要求必须加速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使海军装备在15年时间内向着世界先进水平大跨一步。同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相应搞好部队的人才培养，搞好战场建设、后勤技术保障建设及军事学术研究工作。

4月29日上午，刘华清据此稿在国防大学做学术报告。由于讲稿原本较长，加上刘华清在报告过程中即兴加了不少新鲜资料和史料，时间有点长。从9时开始讲起，近11时刘华清发现才讲了一半，遂有意加快了进度。参加听课的张震校长注意到了，当即上前提醒：放开讲，上午讲不完下午接着进行。结果，刘华清下午又讲了一个多小时。

此次听报告的主要是三部分人：学校教研人员、军事学术研究班学员和进修的部队高级将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熟悉中外海军，在军事学术上造诣深厚，但他们依旧被刘华清的报告震动、感染。时隔20年后，当年在现场听过报告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张晓林，在其主编的教材《马汉海权论研究》序言中说：“1986年4月，编者在国防大学礼堂亲耳聆听了海军刘华清司令关于‘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刘华清司令员第一次代表海军提出了我国‘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这对以后我国军种战略的确立也起到了先导作用……此报告听后不仅使人感到发聋振聩、启迪长思，而且感到中国海军建设峰回路转，春风扑面。1982年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中国的

海洋战略环境日渐严峻，军内军外都有一种紧迫感，而海军建设经‘文革’动乱后亦百废待举，亟需一种理论的参照指导。这一切，不仅促使我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为‘马汉海权论研究’，也促使我脱下绿军装，离开工作多年的南京军区机关，走入紫金山下的海军指挥学院，开始了致力于海权论和海军战略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生历程。”

这次报告后，刘华清为进一步听取海军部队同志们的意见，于5月26日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战役集训班又讲了一次。因讲授对象是海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他加大了联系海军工作实际的内容，反应更热烈。学院训练部的同志们说：海军战略是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同样也是我们教学工作的指导。我们应以此为据，重新研究我们的教材和教学。

经过几次宣讲、修改，刘华清关于海军战略的研究逐步深化，相关理论也日益系统、完善。1986年底，为进一步征求学术界及驻京军队各大单位的意见，海军结合制定发展规划的契机，又召开了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

研讨会于11月18日在海军机关第一招待所举行。中顾委常委、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朱光亚，国防大学校长张震，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及驻京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海军机关各大部领导等，总计85人应邀出席。刘华清与李耀文一起参加，联袂主持。

会议开始，刘华清首先讲话，对大家莅会指导表示感谢，并说明了召开研讨会的宗旨、目的：一是为搞好“2000年海军”课题研究；二是为落实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三是为适应海上斗争形

势的需要。他坦言，海军近年来对海军战略做了些研究，有些意见还在讨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宝贵意见。

刘华清开场白一结束，国防大学校长张震率先发言。张震是军委战略委员会成员，曾全程参与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研究修改，4月份又听过刘华清关于海军战略的报告，所以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发言坦诚、不枝不蔓。他说，海军是一个战略军种，既然是战略军种，就应该有自己的战略。海军战略是一种客观存在。30多年来，我们海军大小战斗打了1000多次，都是在近海打的。部队训练、遂行任务，也基本上没有出过第一岛链，实际上实行的是“近岸防御”战略，只是没有明确罢了。这是由海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和装备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现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海军战略并上升为理论，意义深远。海军知识密集、技术要求高，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没有长期的战略考虑与近期的规划是不行的。明确了海军战略，有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海军战略理论，在海军建设和使用实践中就有了统一的方向、目标和行动准则，进行海军建设决策时也就有了理论依据了。讲到当前世界海洋斗争形势，他显得很激动，提高嗓门说：“现在世界陆地资源日趋减少，人类正向海洋和太空两大领域进军，我国再不能落后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发展现代化的海军武器装备，还必须有先进的海军战略理论。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卫我们的领土主权，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接下来，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糜振玉、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炳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其宗等20多人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赞同以“近海防御”作为中国海军战略，认为海军在新世纪到来前夕研究提出海军

战略，适逢其时，意义深远。“其意义不仅仅是对海军建设、发展的指导，对破除长期形成的‘重陆轻海’观念，唤起全社会的海权意识、海防意识、海洋意识，也将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许多同志还以“近海防御”为指导，对海军装备建设和“海军2000年发展规划”，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19日上午，大会发言接近尾声，工作人员将一个录音机搬上讲台。李耀文庄重地宣布：“听说开这个会，海军老首长萧劲光同志非常高兴。因生病住院无法出席会议，原说搞个书面发言，但萧司令不同意，他说要亲自讲。于是，搞了这个录音。下面播放萧司令的录音讲话。”

开国大将萧劲光是多数与会同志熟悉的老首长，听了李耀文的介绍，大家无不深受感动。随着工作人员将录音机开关压下，会场上一片寂静。

“……要把我国海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就应该确立海军战略。海军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延伸和派生，是在海军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在宏观上指导海军作战和建设的纲。”

几句开场白后，萧劲光进入主题，声音虽不洪亮，但字句清晰：“根据邓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刘华清同志提出我国的海军战略是‘近海防御’，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这符合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一贯主张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积极防御，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近海’表示作战范围，‘防御’表示战略性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屈从外国侵略，也决不进行对外侵略，永远不称霸。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的，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反侵略战争……我们讲了几十年积极防御，诸如‘诱敌深入为主、重点设防为辅’，‘三

分之一任守备、三分之二任机动’，讲得很深很细，那都是讲陆战场。海战场如何进行积极防御？‘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我们是协同陆军进行依托岛岸的‘近岸防御’作战，现在我们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攻防能力的海上战斗力量，能够开辟独立的海战场。”

接下来，萧劲光讲了“近海防御”的作战原则：“‘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并非不要中远海作战，实际上是以近海作战为主，中远海为辅；‘近海防御’是积极防御，不是待在近海等着挨打。只搞近海作战是防御不了近海的。”“我们要认真研究近海问题，从武器装备建设、战术技术提高、战场准备、后勤保障到军事学术研究，都要彻底搞清楚，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为建设现代化强大海军提供理论依据……”

“讲得好！”“太好了！”录音播放完毕，整个会场同声发出赞叹。

20日上午，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结束。两天多时间里，与会人员通过大小会发言，不拘形式的讨论、交流，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论海洋形势，议历史经验，讲海权、海防、中国海军发展，会场始终充溢着激情、热浪。一句话，海军研究、提出海军战略及时、正确，意义深远！

呈报军委审定批准

海军战略研讨会结束后，海军党委关于明确海军战略的报告没有立即报中央军委。刘华清说，不忙，先缓缓！

从下决心研究海军战略那天起，刘华清的心情一直是急切的。这主要在于，他既希望尽快明确海军战略以指导海军的改革和建设，同时也担心自己年事已高，而

海军战略理论内容繁多，在海军司令员任期内无法把研究工作搞完。那时，他真巴不得立即把相关问题一一厘清，报呈军委首长拍板定案。而今，工作一步步做完，只待上报了，他却似乎不急了。正像战略研讨会上专家们讲的，明确中国海军战略，这件事太大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第一次。由“近岸”到“近海”，这是历史的跨越，它将直接影响国防建设、海军发展、国家海洋战略，并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关注。所以，名词概念表述、理论阐释一定要清楚、准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华清拿出两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了对理论文稿的进一步推敲、修改，以及报呈军委文件的起草。直至1987年2月13日，他才与李耀文共同签发了《海军党委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请示》。

《请示》具体报告了研究制定海军战略的目的、经过、理论依据等情况，提出：“我们认为现在提出海军战略问题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目前，海军正按照这一战略理论，指导《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的拟制以及各方面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深深感到明确海军战略，对海军今后的各项建设和作战必将起到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请示》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并中央军委数日后，海军党委办公室接到总参电话通知：《请示》已收到。为便于军委首长审批，请海军就海军战略理论的基本内容提供一个简要情况。遵示，刘华清又组织起草了《关于海军战略问题的简要说明报告》，对海军战略的性质、内容，海军战略的目的和海军作战对象，海军作战海区，海军战略任务，海军兵力战略使用及海军战略要求等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报告。3月21日，刘华清再次与李

耀文联名签发，报呈总参谋部。

4月1日，总参作战部遵照军委首长指示，召集总参机关相关部门及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军委规划办和海军等9个单位的领导，专题讨论研究《海军党委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请示》。会上，与会的十几个人全都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海军党委提出的“明确海军战略”的问题，是一件直接关系到国家海防安全和民族海洋权益的大事，“在世界海洋争夺日益激烈，我国传统海域形势复杂的情况下，提出海军战略，非常及时，极为重要”。同时，大家也对《请示》中关于海军奋斗目标、作战海区等问题的表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先后圈阅批准《海军党委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请示》。至此，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海军战略正式诞生。之后，“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遂正式出现在海军及总部机关各种红头文件中，成为中国海军装备发展、全面建设的航标和指南。

海军战略的确立，在全军各大单位引起强烈反响。时过不久，空军、二炮（即火箭军）等各大军区均都先后组织开展战略理论研究，按照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本部队的发展战略。

海军“近海防御”战略的确立，以及据此在海军部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刘华清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多家西方媒体称其为“中国海洋战略的设计师”、“中国高层转向海洋的一个中心人物”。美国海军理论家戈德曼在研究文章中宣称：“作为中国地缘政治学势力和影响的主要部分，刘华清已经把中国海军安置在通向21世纪的道路上。”（摘自《百年潮》2018年第7期，原文约22000字）

【海外反应】

德国主流网站 WEB.DE 呈现的涉 “一带一路”舆情分析

何 兰 马秀秀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分别提出。这一倡议连接了经济繁荣发展的欧洲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顺利实施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也得到了在欧盟具有很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德国的积极响应。本文选取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的WEB.DE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网站关于“一带一路”的舆情呈现及其原因。

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中德关系得到较好发展。就经贸而言，中国和德国分别是对方在欧洲和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成为在亚投行投票权最高的欧洲国家；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对接被提上日程；两国第三方合作在稳步推进。在这一背景下，WEB.DE呈现的德国及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舆情，反映出其既想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又担心中国凭借国家实力及影响力不断提升而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心理。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之 目的和影响

WEB.DE呈现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两大

层面。

（一）经济层面

该网站呈现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自身经济发展找寻的出路。在其收录的德国科隆经济研究院官网的一篇题为《一带一路：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文章中指出，过去20年，中国的财富增长很不均匀，中国承担高额成本绝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为其经济发展找寻持续增长动力。与之类似，其转自BMW基金会官网上一篇题为《新丝绸之路：欧洲在中国倡议中的战略利益》的文章中指出，鉴于许多生产领域产能大量过剩，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导致红利缩水，房地产泡沫以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必须为其经济发展找寻新动能。此外，其收录的德国著名外交政治杂志IP-Die Zeitschrift上的一篇题为《新手段外交》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缓解中国能源紧张发挥关键作用。新的油气管道、水路的开辟，将会为中国能源进口提供新的选择，中国的航运不再仅仅依赖深受美国控制和恐怖分子威胁的马六甲海峡这一通道。

另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益。在WEB.DE收录的德国经济科隆研究院题为《中国想借“新丝绸之路”来做什么？》的文章中指出，这一战略旨在通过一段时间内全球资本的过量供

给以及经由贸易促进增长,实现富有回报的投资。类似的还有德国广播的评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老路线,新路径》,认为“这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是巨大的推动”。

(二) 政治层面

主要包括三种观点倾向。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提高自身外交影响力而做出的新尝试。WEB.DE转载的德国发展研究院网站的一篇题为《新丝绸之路:中国的“软实力”》的文章指出,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战略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展开中国的“软实力”,也就是说借此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无独有偶,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专家在欧亚经济治理论坛刊物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瞄准中亚》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日本的野心和利益主要限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这个区域中日本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直接竞争者。而在未来,东京将如何参与中亚事务,还有待观察。

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而在欧亚地区扩展地缘战略力量。在WEB.DE收录的《每日镜报》题为《新丝绸之路:世界上最长的班列之旅》的文章中指出,新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外交的一大举措,把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具有极大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借助新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强化其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军力逐渐撤出中亚的同时,中国深化自己与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的联系。墨卡托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的一篇题为《港口、铁路、管道:中国借助新丝路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文章指出,中国利用其宏大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高额的外交费用,为其在欧亚地区扩展地缘战略力量奠定基础。

三是把“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

计划”进行比较,但并未出现负面论调。鉴于某些西方媒体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WEB.DE登载的《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瞄准中亚》的文章中指出,这两大战略很明显不一样。“马歇尔计划”旨在阻碍欧洲的共产主义,而“一带一路”倡议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建设,“马歇尔计划”是一条单行道,只是由美国向欧洲投资。另有一篇文章明确否认“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WEB.DE转自BMW基金会官网题为《新丝绸之路:欧洲在中国倡议中的战略利益》的文章,避谈意识形态,直接认可“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中国周边邻国的和平进程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实现,但中国政府反对为“一带一路”概念贴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标签。此外该网站转自德国民权运动团结党官方网站题为《德国的未来在新丝绸之路》的文章指出,丝绸之路倡议自从2013年被中国政府提出以来,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投资项目,按照当今的购买力计算是马歇尔计划的12倍。只有通过和新丝绸之路—马歇尔计划合作,我们才能够参与重建近东、远东和非洲进程,从而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解决难民危机。

关于德国及欧洲对“一带一路” 倡议之态度

WEB.DE呈现的德国及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一是认为“一带一路”为德国及欧洲发展带来了重大利益和发展机遇。二是认为德国及欧洲应该摒弃观望态度,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到这一倡议中来。

从德国来看，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本国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德国企业要积极参与。正如网站收录的德国民权运动团结党官方网站文章《德国的未来在新丝绸之路》所指出的一样，通过这一战略的帮助，中产阶级会获益巨大，借此创造许多生产性的工作岗位，这在德国要提上日程。德国《市场和中产阶级》杂志中的一篇题为《亚投行期望德国中产阶级参与》的文章指出，亚投行项目的合作融资对德国公司而言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它们可以借此得到参与那些富有吸引力项目的更好机遇。另一方面，德国认为其正深受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让德国在政治上有更多的选择性。博客POLITAIA官网发布的一篇题为《新丝绸之路是德国解决危机的方式》中指出，要解决德国金融、经济、难民以及伦理道德等不同方面的危机，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丝绸之路这一双赢战略。如果德国要承担起历史责任，我们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积极参与。德国文化和平机构联合会网站一篇题为《人道的、联结的概念——“新丝绸之路”——将为全世界积极接受并得到持续发展》的文章指出，战略形势的这种大变化意味着德国要有全新的政治选择，也就是说要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南欧、近东和非洲地区，这也是以人道主义方式解决难民危机以及铲除恐怖主义温床的唯一方法。

从欧洲方面看，认为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一直单方面认为这一倡议对其势力范围造成了“威胁”，时常炒作这一倡议挑战了现有国际秩序，但许多欧洲国家认为这一倡议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补充，符合欧洲的整体利益，多

国加入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即是证明。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机构SWP出具的一份题为《地缘经济遇上地缘政治》的研究报告中，对中欧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合作持积极态度。该报告指出，为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能更好地达成一致，欧盟和欧洲国家必须对中国这一倡议的经济和政治维度进行通盘讨论与评估。无独有偶，来自俄罗斯媒体《共青团真理报》的评论《欧洲与时代精神脱拍：新丝绸之路指明了道路！》中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长期发展计划的国家。2005~2014年，在25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中，70%的民众生活质量缩水，人们面临持续贫困化的危机。而中国却让6亿人脱离贫困，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必须重组其摇摇欲坠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再以新丝绸之路的视角参与建设我们的世界。

WEB.DE 呈现的涉“一带一路” 舆情解读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WEB.DE对该倡议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收录文本数量稳中有升，文本主题集中于倡议本身及与德国的贴近性。“一带一路”提出伊始，WEB.DE收录的文本数量很少，直到2015年《愿景与行动》发布以后，WEB.DE收录的文本状况才随着外界关注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其更多关注的是与德国及欧洲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与事务。由此也提示我们，在国家某项重大涉外战略或政策出台伊始，官方及时发布具体、权威的阐释十分必要。

第二，该网站呈现的涉“一带一路”舆论总体正面，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自身和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寻找的新出路。具体包括：“一带一路”旨在提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也是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做出的新尝试；让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世界和平；为德国创造更多经济发展机遇，有助于解决难民危机。这些基调的形成，与其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德国智库政策导向性强，专家学者总是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其次，中国与德国及欧洲诸国距离遥远，不存在领土和边界问题；再次，中欧经济互补性强，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是欧洲实现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依靠；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中欧之间贸易往来更加畅通，而经济的发展又能反向促进中东欧地区局势的稳定。因此，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想搭乘“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为其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机会，为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路径。

第三，WEB.DE收录的文章中，未能规避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图的讨论。这虽然不是网站内容呈现的主流，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其实，地缘政治是分析国家政治经常被考虑到的因素，但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追求地缘政治，却是过时的冷战思维作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一带一路”又体系庞大，涉及国家众多，使得个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国家为其贴上了中国扩展空间的标签。事实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上不会一家独大。仅在2014~2016年，中国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就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500亿美元。截至2017年8月，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已有6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亚投行成员增至近80个。中国正以十足的诚意和坚定的行动落实着“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

欧洲是“一带一路”的终点，而德国作为欧洲强国是我国在欧洲推行该项倡议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德国是我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德国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又会因其在欧洲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产生示范和引领效应。其中，民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倡议的实施。由于地理上距离遥远，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鉴于此，有代表性的德国网络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舆情呈现，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民众对该倡议的看法。据目前研究来看，该倡议在德国形成的舆论氛围相对正面，这为我国在德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但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所谓中国“追求地缘政治优势”等负面基调仍旧存在，虽然并未占据上风，但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借此，我们应该认清形势，有的放矢，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乃至欧洲顺利推进，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摘自《国际论坛》2018年第2期，原题为《德国主流网站WEB.DE呈现的“一带一路”舆情研究》，约12000字）

【报刊荟萃】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 蔓延需精准发力

江大伟

相比于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介,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呈现出许多新态势。一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受众面大。二是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隐匿化。三是传播内容碎片化、细节化。四是传播方式多样化、娱乐化。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在网络空间呈现出不断蔓延的态势。抵制网络传播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需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结合运用网络新媒体手段,积极发声,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不断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一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运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认识、研究历史问题,澄清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思想困惑。二是要站在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三是要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发声、解疑释惑、正本清源,掌握网络宣传阵地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四是着力构建网络信息安全法治防火墙。加大新媒体平台信息监管力度,完善互联网监管体系,加快信息传播的立法进程,净化网络空间环境。(摘自《宁夏党史》2018年第4期,原文约6000字)

人民政协在参与改革开放中 实现自我发展

王翔

人民政协不仅见证和分享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辉煌成就,也置身其中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人民政协事业始终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向推进、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人民政协为改革开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两者关系密切,荣辱与共。人民政协不仅从未缺席我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进程,而且还是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政治力量;1982年宪法,首次把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写入了宪法序言,开启了政协事业的新境界;人民政协性质的不断完善以及在国家发展中定位的不断明晰,使人民政协在改革开放事业中有了更大作为;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不断拓展和丰富的,契合了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和人民政协自身发展要求;人民政协的政治功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强化,从最初的统一战线组织,到“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再到“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直到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这一系列政治功能的新概括,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对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认识的新飞跃,是党中央对人民政协的新期待新要求,也是人民政协发扬新作为、发挥新作用的政治动力。(摘自《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原文约6000字)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 话语体系及其发展

佟德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道路要素;以中华民族为总体指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民族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要素;以经济为基础、文化为导向的复合的民族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容要素;“国家—民族”、“人民—民族”的复合民族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主体要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原则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并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渐进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突显，与现代化共同构成了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性要素；越来越强的文化导向是理解民族观念的重要维度；民族话语的改革与和谐的色彩越来越突出。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在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表现出良好的继承性，这就是民族话语体系的“常”，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基本导向，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也表现出良好的创新性，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不断发展的轨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变”。在这一渐进变迁的进程中，民族话语的现代化目标逐渐转向复兴目标，同时，民族话语的文化内涵越来越突出。（摘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

两岸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 及比较分析

王英津

大陆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当时主要是针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而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不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主要是针对岛内出现“台独”活动。尽管大陆方面近七十年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始终没有任何变化，但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文字表述前后却有一个策略性调整的过程。概括起来，一个中国政策的要义包括以下五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尚未统一只是暂时现象，未来两岸必将实现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内涵。仅仅是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势，不同时期的论述有不同侧重而已。台湾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前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具体包括：两蒋时期

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守；李登辉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背离；陈水扁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抛弃；马英九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有限复归；蔡英文上台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破坏。上述比较表明，大陆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其变化仅仅是策略上的调整；而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变化则是战略上的根本改变，这是两岸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最大不同。（摘自《台湾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1952~1984年中国GDP历史

数据的补充

许宪春 吕峰

由于中国从1985年开始进行GDP核算，所以没有1985年以前年度的GDP历史数据，从而无法从可比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无法对改革开放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有鉴于此，国家统计局分两次对1985年以前GDP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补充。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1988年间进行的；第二次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1989年间进行的。这两次重大补充的内容基本相同，既包括GDP生产核算，也包括GDP使用核算。两次重大补充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生产核算方面，首先对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餐饮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进行调整，扣除其中对非物质服务的支付，增加固定资产折旧，得到这些部门的增加值；然后补充计算各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将各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相加，得到GDP。在使用核算方面，对国民收入中的消费总额、积累总额、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对消费总额进行补充和调整，是在国民收入的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的基础上，分别加上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消费支出中的非物质部分和社会消费核算所依据的各项费用中的非物质消耗部分，使之分别形成GDP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积累

总额进行补充和调整,主要是把固定资产折旧补充到国民收入的固定资产积累中,使之成为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主要是把非物质服务进出口补充到国民收入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中,形成GDP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摘自《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约15000字)

水利民主改革与水资源 公共性的彻底实现 祁建民

水利民主改革是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否定,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过去在水资源利用上的各种不合理制度和习惯实行改革,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这一点在山陕这样的干旱地区尤为重要。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废除地主、豪绅把持的水权,取消封建水规,解决用水上的不公平、不合理问题。在中共领导下,山陕地区进行了水利民主改革。山西省在当时进行了“灌区民主改革”,陕西省则实行“小型水利民主改革”,由此使得水利资源的公共性彻底实现。水利民主改革的内容:宣布水权归公,废除封建水规;破除迷信,否定神权性水规和剥削;解散传统水利组织,建立水利委员会和水利代表会;解散传统水利组织,建立水利委员会和水利代表会;整顿河道渠系,合理灌溉使水。土地改革时期的水利民主改革,是中国水利史上划时代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水资源的公共性得以真正实现,公共权力真正延伸到水利社会的最基层,传统水利共同体造成的利益区分被打破。通过水利民主改革,取消了不合理水权,从根本上实现了水资源的公共性本质,破除了传统水规,实现了公平合理用水,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保障了农民生活用水,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原题为《水利民主改革与水资源公共性的彻底实现——以山陕地区水利社会史的变革为中

心》,约12000字)

“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村文化政策 关注的重点 刘彦武

改革开放以来,在1982~1986、2004~2018年期间,出台的20个“中央一号文件”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成为顶层设计的风向标。以“文化”作为关键词检索,20个“中央一号文件”平均6频次,2018年最高33频次。有3年的文件为零频次:一个是农村经济主题,一个是农村水利主题,一个虽没有出现“文化”词条,但论及了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2006年、2008年、2015年、2016年、2018年这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安排了专章论述农村文化,从字词、语句到段落、章节,反映了党和政府一以贯之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关注:牢牢把握乡风文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紧紧扭住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个短板;始终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目标;长期重视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新途径;一以贯之关心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力量;持续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机制;重新考量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逐渐重视打造农村文化产业新希望。梳理这些政策关注的重点,可以准确把握顶层设计的政策表达和政策信号,分析党和国家对农村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理解的内在逻辑以及农村文化政策主题变迁。(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原题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政策演变及展——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研究》,约8000字)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的 发展演变 徐选国 赵阳

社会工作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从无到有,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的共享发展功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两条非常根本的线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模式转变,

是管理取向还是治理取向；二是改革过程中社会力量发育程度的高低。改革开放前，中国属于“有政府、无社会”的总体性社会状态，改革开放后第一个20年是“大政府、小社会”格局，21世纪最初的10年是“精简政府、管理社会”格局。与此相对照，目前中国社会治理格局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可以称为“现代政府、共治社会”的阶段。在单位制时期，没有社会力量，国家治理主要通过“单位制”进行，这个时期社会工作是整体空缺的；改革开放的最初20年，社会力量有一定的发育，社会工作主要在民政系统内得到重视和发展，并成为此阶段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专业力量，但由于其尚不成体系和规模，其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中还处于边缘位置；党的十六大，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以来，社会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重视，社会工作被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宏观进程之中，但其发展主要呈现为一种依附式发展逻辑；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治理的管理模式，强调多元参与、合作共治和共建共享，使得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有了更多的合法性空间，并彰显出更加明显的自主性特征。（摘自《新视野》2018年第4期，原题为《迈向共享发展：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结构转向》，约12000字）

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到社会

谭建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诞生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成为促进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青年人率先探索、共青团组织率先推动的“青年志愿服务”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进行分段考察，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生活文化语境，志愿服务发展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1978~1987年，团员青年率先探索学雷锋志愿服务新形式；1988~1997年，共青团推动青年志愿

者行动蓬勃兴起；1998~2007年，青年推动志愿服务形式灵活多样；2008~2017年，青年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创新；2018起，青年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制度建设。青年作为志愿服务的发起者和践行者，促进志愿服务与经济改革相结合、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城乡民生改善相结合、与精准扶贫助困相结合、与新一代人成长相结合、与生态环保发展相结合，青年推动志愿服务成为改革开放新时尚，让“志愿中国”成为国家的新形象，同时促进志愿服务成为社会建设新元素。在社会建设进程中，志愿服务纳入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元素、国内凝聚力、国际软实力，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到社会——改革开放40年青年志愿服务的价值分析》，约10000字）

中国海军战略文化的历史转型

徐立特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海军外交处于韬光养晦、积累实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海军外交处于“调整推进阶段”。人民海军开始频繁走出国门，20年中十余次派出编队出访20多个国家，航迹遍布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这其中外交重点是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海军过去不参加同别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惯例被打破，海军的外交功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发展。

冷战后的第一个20年，海军外交基本出发点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其所展现的战略文化也是崇尚稳定、和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海权”概念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形成热潮。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国的海军实力还处在初级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原因是海军外交的指向还是内向的，即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唯一重要任务。

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在“陆权”与“海权”的辩证思考方面产生了重大突破，对于

国际格局变化引起的真空地带在认识上有了新发展，并且国际公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军战略文化有了从内向整合到外向开放的重大转型。中国海军战略文化的稳定与成熟是在进入新千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这种稳定与成熟，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深蓝海军在海洋公域活动方面的作为，在意识格局上的表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海外维和护航、打击海盗，还是在开发北极方面的积极态度，都是跳出固有区域，展现新时代中国海军战略文化向开放、包容和成熟转变的姿态。中国在海洋公域事务方面有所作为，是中国摆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岛链封锁的有力举措；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战略文化的胆识与智慧。（摘自《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原题为《新时代中国海军外交中的战略文化——以海洋公域活动为例》，约12000字）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

杨娜

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处于国际治理体系边缘但谋求独立自主的“站起来”阶段、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经济体系紧密相连的“富起来”阶段、引领全球治理并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强起来”阶段。回溯历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诸多方面发生变化，特点体现在对国际机制由疏离到参与再到引领、参与主体由单一到多元、参与领域由聚焦经济扩展到全方位、参与路径由遵守国际规则到推动革新以及形成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全球治理观。形成以上特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交织、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以及全球治理失灵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启示包括依托雄厚的国家实力把握历史机遇、巧妙运用国家实力审慎引领全球发展、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目标及路径对接、全球责任担当助力国际话语权提升以及改革开放实践行动与全

球化观念更新同步发展。（摘自《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8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约12000字）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陶文钊

回顾40多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双方是一个不对称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它意味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民族认同和尊严，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对美国则远没有这样的意义。美方常说，它关系到道义和美国的信誉、对盟友和朋友的承诺，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它显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一个能够加以控制、操纵和搁置起来的问题。第二，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共识，都主张一个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中国的最终目的无疑是统一，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而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状况是两岸不统、不独、不武，台湾与祖国大陆实际分离的局面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最根本的分歧。第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一个两面的政策，一方面，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仍然要保持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包括售台武器在内的军事关系。这是引起中美关系颠簸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对中方不变的要求；中方的态度也很明确，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非和平方式，不许任何势力、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2005年3月中国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把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意旨上升为法律。这是中方的底线。如果“台独”势力敢于铤而走险，如果美方冲撞中方的红线，那就是启动这个法律的适当时机。第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大框架中的一个问题，美国对台关系也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内进行处理，美台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非官方的关系。第六，近40年来，美国国会里有相当大的亲台势力不断兴风作浪，每年都提出各种决议、提案，实际主张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为了与中国进

行竞争，美国试图全面提升对台关系，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摘自《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四十余年的回顾与思考》，约8000字）

中国中东外交的体制创新

王 猛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涉及中东外交相关决策的体制变革一直在创新，经历了从协调性的各类“小组”机构到权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历程，中东外交的协调和决策能力得到提升。从1981年恢复建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到2000年建立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外交部、外贸部（现商务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有了基本的统筹和协调，有效应对了从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中东事务。只是鉴于当时包括中东外交在内的外交工作整体状况，这两个小组本身属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是主要的办事机构。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中国外交的体制创新开始步入快车道。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角色定位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为中国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了打破既往在对外援助项目部署和实施上相互分割和重叠的“碎片化”管理局面，提高执行效率和形成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和高效开展，国家“国际开发合作署”在2018年4月18日正式挂牌。此举可以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国际开发合作署的成立

既反映了中国不断扩大国际发展合作的必然产物以及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更代表着中国以更开放和合作的姿态展现其全球抱负并意欲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摘自《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原题为《“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传承与担当》，约15000字）

1949~1965年中国阿富汗关系 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

张 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阿富汗当作睦邻外交的重要对象，从而使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缘环境下，中阿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自身因素、美苏大国因素和印巴邻国因素的影响。中阿关系的演变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即搞好睦邻外交，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互谅互信；必须始终同周边国家建构利益共同体，互惠互利；必须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障碍；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分析、把握当事国的国际国内局势。综览这一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国政府正是始终贯彻睦邻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善于同周边国家建构利益共同体，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审时度势，提高对当事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促使了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地向前发展。当前，中国周边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中国政府仍需继续高举睦邻外交的旗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的方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为《新中国睦邻外交视阈下中阿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经验（1949~1965）》，约8000字）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要目及摘要

· 第十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专题 ·

〔编者按〕2018年6月7~8日，以“陈云研究与改革开放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十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陈云纪念馆、福建龙岩学院联合主办，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70多位入选论文作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作者以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旨，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现将大会开幕词和学术总结刊出，以飨读者。

在第十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深化陈云生平和思想研究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朱佳木

——第十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总结

张星星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刘 斌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核心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加强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为当前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嬗变及启示

——兼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的批判

李祥兴 王先俊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历史嬗变，一定程度上与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同步，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以计划经济为主，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1992~2012年，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至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认知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多种经济学说尤其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影响。梳理和总结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历程的嬗变，不仅可以使我们

感知这一历程的艰辛，揭示党和政府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还可以划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 改革开放史研究 ·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探析

刘 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探索、全面展开和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在中共中央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下，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四大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实践表明，坚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坚持文化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辩证统一，坚持文化强国战略和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辩证统一，坚持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考察

朱孟光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汇聚地。伴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高校学生既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思潮影响而感到迷茫、困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应对这些具体问题中得以整顿恢复、改革发展。深入反思这段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高校应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谋划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把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点，着力提升其辨别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实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目标。

· 经济史研究 ·

1949~1960年中国农田机电排灌研究

冯兵兵 赵凌云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机电排灌作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容，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到逐步恢复和快速发展。1949~1960年中国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5年为缓慢起步阶段，我国相继在基础较好、群众迫切需要、增产效果显著的地区建立国营排灌站试点并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政策，农田机电排灌得到逐步恢复和初步发展；1956~196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排灌机械数量和机电排灌面积迅速增加，农田机电排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水旱灾害的严重威胁、农业机械化政策的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排灌机械生产能力的提高、机电排灌低成本和高效益的显著优势。1949~1960年中国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工程和设备的合理配套、管理组织水平的提升、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效益的提高对于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稳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手工业中劳资、雇佣、师徒关系问题研究（1949~1953年）

韩晓青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中的劳资、雇佣、师徒关系相比旧社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但在1953年却一度出现了紧张的情况。这种紧张局面的出现与手工业中劳资、雇佣、

师徒三种关系的混淆以及“五反”运动中对这三种关系不能准确区分有一定关系，因而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现象。湖北省召开了手工业代表会议，对改善这三种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之后中央对湖北省的经验进行了推广，三种关系的紧张局面逐步得到了改善。

·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

邓峥云

〔摘要〕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性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陷入了恐慌，美国公开宣布要使用一切办法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目光转向此时开始出口石油的中国。而中国同时也需要美国的石油技术和设备。由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掣肘和既有双边关系的限制，中美双方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这种合作还是起到了改善和提升中美关系的作用。1978年，中美围绕石油展开的贸易和技术合作走上快车道，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 外交史研究 ·

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政府的居间调停

奚庆庆

〔摘要〕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美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最终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危机期间，为避免中美发生战争，对英国国家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英国敦促美国不要公开宣称对金门等岛屿负有防守义务，希望美国督促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另一方面，英国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希望中国政府在维持对沿海岛屿主权的同时放弃使用武力，并充当了中美进行谈判的中间人角色。英国的外交斡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海地区实现短暂和平。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赵学功 王亚萍

〔摘要〕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英国在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政策的同时继续宣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致使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揭示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

· 地方史研究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贵州省农民水利建设

李安峰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贵州省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广大农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投身到水利建设中，他们拥护政府制定的政策，承受合理负担，支持建设征地，兴修示范工程，参与水利技术培训等，掀起了全省水利建设的热潮，在恢复整修和新建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也为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